

# 当改革遇见王安石

陈胜利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改革遇见王安石 / 陈胜利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02-50004-9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王安石（1021-1086）—人物研究  
IV. ①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6803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王 佳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0mm×230mm 印 张：19.75 字数：283千字

版 次：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元

---

产品编号：078987-01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

以余观之，吾国史书之中，其最宜为学者所深思审问，必得其实而求其所以然者，殆无如熙宁变法之一事。

——严复

# 引 言

北宋是变革的王朝，一百六十七年间发生了三次大改革：太祖主导的宋初政治军事改革；仁宗朝的庆历新政；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施行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丰变法”。

宋初的改革，以分权制衡为要，辅之以右文抑武之策，抬高文臣，压制武将，目的是为汲取晚唐五代教训，防乱兴治。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改革，乱的问题解决了，但却无形之中埋下了军事积弱的种子。

北宋由军人集团创建，宋太祖赵匡胤发于卒伍，军中不乏优秀将领和敢战之士，建国不到二十年便基本完成华夏地区的一统。但自太宗朝开始，军事积弱的种子悄然萌发，对外用兵屡遭失败。太宗两次兴兵伐辽，均大败。真宗时，辽军兵临澶州城下，兵锋直指北宋京师开封，真宗御驾亲征，扭转战局，但宋廷还是以输岁币为代价，与辽朝缔结澶渊之盟。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仁宗时，党项元昊在西北称帝建国，随即与北宋展开大战，宋军一败再败，损失惨重。辽朝乘机渔利。为应对西夏与辽朝的进逼，宋廷大规模扩军，军费陡涨，财政捉襟见肘，百姓负担加重，兵变、民变四起，统治危机日甚一日。

穷则思变，弱则图强。

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春秋管仲，战国李悝、商鞅，西汉桑弘羊等通过实施变法，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在多方因素作用下，仁宗庆历年间，以及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廷亦先后两次施行改革。

但搞改革谈何容易。历史上不乏失败的改革，轻者，如唐朝中期的

永贞革新，改革的发动者——“二王八司马”全部遭到贬逐；重者，如两汉之间的王莽改制，国家覆亡，王莽落得身首异处。

宋初的政治军事改革并非是一次典型意义的改革，原因在于，这次改革主要是革前朝之弊，而拨乱兴治几乎是任何一个新王朝改朝换代的常态工作。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则不同，它们发生的时段正值王朝中期，均针对自身积弊，统治阶层有推动改革的意愿，改革家设定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实行了涉及面较广的改革举措。只可惜，庆历新政一年后草草收场，王安石变法亦功败垂成。

王安石变法更具雄心，前后持续十六年之久，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改革。争议在于，王安石变法四十年后，北宋就被金人革了命，王安石变法是否应当为国家覆亡承担责任？九百余年来，人们的观点尖锐地对立。《宋史》的官方定论是，王安石变法变乱国家，激化党争，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另一派则认为，新法均是良法，王安石变法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与北宋亡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孰是孰非？

王安石变法具备诸多有利条件，神宗是励精图治之君，力主变法，王安石本人具有非凡的胆识与才干，但变法何以最终失败？

王安石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争议的改革家。

王安石写过一首意味深长的诗——《读史》，诗曰：“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黜黜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其大意是：自古功成名就者都历经了千辛万苦，他们的事迹会由谁记载呢？当时的人尚且难以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世更是众说纷纭，看不清真相了。史书上流传下来的并非都是精华，就如同最难画的是人的精神。可

叹总有人死守典籍，不肯醒悟。

王安石的这首诗写于熙宁初年，此时，新法刚刚推出，但很快便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王安石道出了这样的深意：所谓历史，其实有两部，一部是记录在史书中的历史，一部是历史本身。他暗示了自己不屈的立场，并向后人设问：当历史烽烟散尽，那些深埋于“千秋纸上尘”中的事实与真相，能够水落石出吗？

# 目 录

- 一 殷鉴不远 · 001
- 二 新宋，不能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 · 006
- 三 军事积弱与国家的竞争 · 012
- 四 庆历新政，仁宗“拉抽屉” · 020
- 五 “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 · 026
- 六 王安石两上改革书 · 033
- 七 有志之士 · 039
- 八 治州县，不为俗吏 · 044
- 九 有志者得志 · 050
- 十 新君的困境 · 055
- 十一 当改革之君遇见改革之臣 · 060
- 十二 大改是神宗的首选吗 · 066
- 十三 延和殿一锤定音 · 071
- 十四 得君者行道 · 080
- 十五 “强”相的落空 · 085
- 十六 吕海急于发难 · 092
- 十七 商业的改革 · 098
- 十八 助农之法 · 105
- 十九 军事与科举改革 · 116
- 二十 “此一时彼一时”，庆历革新派蜕为变法的最大阻力 · 121
- 二十一 意见不同，荐主反目 · 128
- 二十二 台谏阵地的争夺 · 133
- 二十三 “国是”已定，神宗弃用司马光 · 139
- 二十四 形势的急转 · 147
- 二十五 王安石首罢，吕惠卿难当大任 · 154
- 二十六 王安石再罢，神宗调整变法策略 · 159

|                   |                       |
|-------------------|-----------------------|
| 二十七               | 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 · 164       |
| 二十八               | 可怜无定河边骨 · 170         |
| 二十九               | 都堂之上，已无安石 · 176       |
| 三十                | 归去，仍是一介书生 · 181       |
| 三十一               | 党争的先声 · 188           |
| 三十二               | 党争升级 · 194            |
| 三十三               | “国家之患，率由此也” · 200     |
| 三十四               | “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 · 206 |
| 三十五               | 污名化王安石，那是必须的 · 214    |
| 三十六               | 宋人笔记与元明文学中的王安石 · 222  |
| 三十七               | 辩诬 · 230              |
| 三十八               | 正名 · 234              |
| 三十九               | 新的眼光 · 241            |
| 四十                | 法败的主因 · 246           |
| 四十一               | 神宗的摇摆 · 251           |
| 四十二               | 文化因素 · 257            |
| 四十三               | 富国与富民 · 263           |
| 四十四               | 不合实际 · 268            |
| 四十五               | 灵活性的不足 · 274          |
| 四十六               | 用人的失策 · 279           |
| 四十七               | 变法有成功的可能吗 · 284       |
| 四十八               | 改革遗产 · 293            |
| 附录：王安石变法大事记 · 299 |                       |
| 参考文献 · 302        |                       |
| 后 记 · 304         |                       |



## 一 殷鉴不远

历史是一条长河，它中游的激流一定携带着上游的水文特征，并对下游的水势与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盛唐，造就了中国古代的盛世传奇。经过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开疆拓土，唐朝的宿敌——突厥被彻底击败，到唐玄宗李隆基时，国土相当辽阔，国家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固边、防守。唐朝的对手大都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骑兵军团，要求唐将有迅速决断的权力，于是，玄宗在边地设十个兵镇，将权力授予边将，以节度使为最高长官，统领数州，不仅掌军，而且兼管行政，权力极大。《新唐书》称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唐初实行府兵制，军力部署上外轻内重，全国的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中，有二百六十一个位于关中，以保证中央王朝有足够兵力拱卫京师。唐玄宗置十镇节度使后，边镇兵力渐强，天宝年间（742—756）达五十万，主要布防于东北和西北，中央兵力不满八万，形成外重内轻之势。东北方面为河北三镇——平卢、范阳、河东，主要防御东北“两蕃”——奚、契丹。西北方面为河西、陇右二镇，防御吐蕃。

致命的是，杂胡出身的安禄山一人身兼河北三镇节度使。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清君侧为名，率属下唐

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共十五万人在范阳发动叛乱。平卢镇将领、突厥族人史思明跟随起兵。叛军势大，不到一个月便攻下东京洛阳，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六个月后，安史乱军攻下潼关和京师长安，玄宗逃往四川。玄宗之子肃宗在灵武继位，调集勤王军平叛。叛军内部后来出现严重纷争，安禄山、史思明分别被亲子安庆绪、史朝义所杀，局势得以扭转。763年春，史朝义兵败自杀，历时七年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拐点，后果极其严重。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从安史之乱到中晚唐，再到五代，国家由盛转衰，由衰而乱，留下了一长串负面清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五代之乱等。

尽管藩镇节度使权力过大是安史之乱的乱源，但安史之乱时，为平叛的需要，唐朝不得不对内地掌兵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安史之乱后，唐朝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但中央王朝已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到，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一个是唐朝，一个是安史叛军的老巢、半独立的河北三镇。这种割据状况后来遍及全国，各藩镇不服朝廷管理，一镇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节度使相当于一国之主，或者自任官吏，或者不上缴国税，甚至公开称王称帝，与中央分庭抗礼。

河北问题在宋朝兴衰中亦扮演重要角色。936年，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换取契丹出兵帮他灭后唐。燕云十六州与河北三镇北半部范围相当，是中原王朝防患北方游牧民族的最重要屏障，自此，它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中原的基地。夺回燕云十六州成为北

宋的心结，宋太宗两次北伐，均大败。金人以之为饵，引诱北宋联合灭辽，结果，辽是灭了，北宋也紧跟着被金人所灭。河北这片土地，直到明朝才恢复为汉人的疆土。石敬瑭的这一割，贻害了四百年。

安史之乱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经济社会破坏严重，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士民南渡，带来大量人口和先进生产技术。安史之乱中，唐将张巡、许远坚守睢阳十个月，将叛军阻挡在江淮一线，保全了江南，南方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迁刺激了政治重心的东移。安史之乱后，京师长安仍屡遭战乱破坏。代宗时，吐蕃攻占长安。德宗时，泾原兵在长安发动叛乱。僖宗时，黄巢军两度陷长安。昭宗时，长安连遭大火，朱温拆毁宫室，逼昭宗迁都洛阳，长安沦为一片废墟，无力支撑起政治中心的地位。相比洛阳，开封有漕运之利，可通过运河将江南富庶之地的物资运达。朱温建后梁，定都开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宋朝均定都于此，中国古代都城告别黄河时代，开启运河时代。

唐代神策军兴、宦官专权亦是安史之乱的结果。神策军原是唐朝为对付吐蕃而在西北组建的戍边部队。安史之乱爆发后，神策军赴中原参战。后来，这支军队归宦官鱼朝恩统领。代宗时，神策军正式成为中央禁军。之后的德宗朝，宦官掌神策军引为定制，兵力扩大到十五万之众，领军宦官权势熏天。唐朝包括武周历二百八十九年、二十一帝，其中，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八帝，都是经宦官一手拥立，宪宗、敬宗更被宦官所杀。宰相大臣被宦官所杀所黜者，不计其数。

从宪宗朝开始，经穆宗、敬宗、文宗到武宗朝，牛李党争前后持续大约半个世纪之久。李德裕领衔李党，牛僧孺、李宗闵领衔牛党。李党大都出自门阀世族，牛党大都出自庶族地主，双方政治主张针锋相对。牛李党争时，正值宦官势大，两党均依附不同的宦官集团，相互倾轧，文宗曾感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赋税锐减。807年（元和二年），天下方镇四十八个，其中十五个不向朝廷报户口，不上缴税收。朝廷控制的税户仅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年间减少四分之三。天下军队由朝廷提供给养的有八十三万多，比天宝时增加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每两户人家就得供养一个士兵，官民矛盾激化。懿宗时，以庞勋为首的桂林戍卒哗变，起兵北还家乡，先后攻占徐州及江淮一带州郡，一年后被镇压。仅过了五年，黄河以北大旱，饥民揭竿而起，王仙芝战死，黄巢被推为义军统帅。黄巢转战南北，于881年攻入长安，建大齐政权。唐军于次年组织反攻，黄巢部将、同州防御使朱温叛变降敌，沙陀族李克用应唐朝乞援率劲旅南下。义军不敌，黄巢撤出长安，于884年在泰山狼牙谷兵败自杀。

因镇压黄巢起义起家的朱温、李克用成为晚唐最有实力的军阀。昭宗时，朱温诛宦官，废神策军，将昭宗置为傀儡。904年，朱温逼昭宗迁都洛阳，随即遣人杀之，立其子哀帝。907年四月，朱温废哀帝自立，建立梁朝，建都开封，史称后梁，五代大幕拉开。

五代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中原王朝，短短五十四年间，有八姓十三人登上皇位。五代之外，华夏地区各地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等十几个割据政权，统称十国。前人往往把五代称为“五季”，意为“末代”“最差”的时代。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指出：“五代十国，是中国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则几乎只有骄兵悍卒，跋扈的将帅。连轻薄的进士，也如凤毛麟角。天地闭，贤人隐。”

俗语“眼中钉”讲的便是五代故事。后晋晋昌节度使赵在礼聚敛财富，不遗余力。他在宋州任上时，百姓深受其害，后来朝廷有诏，将他移镇永兴，百姓听到后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说：“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赵在礼听到后恼怒异常，特意上表请求再留任一年，后晋朝廷竟同意了。于是他下令境内按户每年增收一千文钱，谓之“拔钉钱”，并严令各地官吏催督，不按数缴纳的，严刑拷打。

安史之乱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五代、宋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安史之乱源于最高统治权力的争夺，交织以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民族矛盾与冲突等，由此激发藩镇割据、武人擅权、宦官及党争之祸等一系列严重政治问题，最终令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历史是中国人民的信仰，“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以史为鉴，是中国古老的传统。

在深入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及唐五代政治乱象严加防范，构成了宋初政治兴革的动力。

## 二 新宋，不能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

中国历史上的几大封建王朝，在其建立之前，大都有一个短暂的王朝为其奠基，这些短暂的王朝不同凡响，只是，它们的光芒往往被后起的王朝掩盖，比如秦之与汉，隋之与唐，后周之与宋。

后周是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历两帝、十年，也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前后两任皇帝太祖郭威与世宗柴荣均是难得的明君。

郭威出身职业军人，辅佐后汉高祖刘知远建国，但刘知远死后，其子隐帝刘承佑即位后大杀功臣，郭威被逼发动兵变，建立后周。

五代王朝兴替，有斩尽杀绝的传统。朱温称帝，把李唐皇室近亲杀光；后唐时，李嗣源称帝，把前任皇帝庄宗李存勖诸子杀光；末帝李从珂继位，又杀尽李嗣源诸子。郭威一改前朝滥杀恶习，兵陷开封时，不杀后汉宗室。有人提出，可比照西晋对待曹魏小皇帝曹髦的办法，以公爵之礼安葬死于乱军中的隐帝。郭威没有同意，他奉后汉李太后为母，迁于西宫奉养，停朝七日，为隐帝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郭威将受隐帝派遣，杀尽自己家小的权知开封府刘铢和权侍卫马步军督虞侯李洪建枭首于市，但赦其家人。

郭威上阵打仗时，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在军中接见宾客时，穿宽袍大袖，风度儒雅。

与五代重武轻文的风气不同，郭威亲自到曲阜拜奠孔子，并从民间找到孔子、颜回后人，授以官职。郭威幼年孤贫，深知民间疾苦，力行节俭，废除了前代苛捐杂税和残酷刑法。

郭威的出现，使唐末以来极混乱的北方、中原社会开始走上安定的道路。历史迎来转身的时刻。

954年正月，郭威病死，遗命妻侄柴荣即位。柴荣继续执行郭威的路线。他率军夺取后蜀秦、成、阶、凤四州。三次亲征淮南，夺取南唐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又于959年三月率诸军北伐，以夺回燕云十六州。辽军望风而降，柴荣连取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和易、莫、瀛三州十三县，关南之地平定。正当他与诸将商议如何攻打幽州时，不料突发重病，北伐乃止，中原王朝痛失收复燕云的历史机遇。

柴荣率军于六月返回开封，病情加重，开始安排后事。他解除郭威女婿张永德的兵权，任命亲信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统率禁军。不久，不到四十岁的柴荣驾崩，他七岁的幼子恭帝柴宗训继位。但此后不到一年，960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

亲历五代之乱的宋太祖赵匡胤深知，不汲取唐五代教训，不消除历史的负能量，他新建的王朝有可能重蹈覆辙，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

立宋后的第二年，961年七月，太祖问心腹大臣赵普，五代战乱不断，老百姓遭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熄灭战乱，使国家长治久安，该怎么做？

赵普回答：“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大道至简，管用的道理并不复杂。收了方镇节度使的权力、军队和钱粮，把“君弱臣强”局面恢复到“君强臣弱”的常态，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太祖茅塞顿开，立刻说：“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太祖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奉为圭臬，着手对国家军事政治体制进行大幅改革。改革目标十分明确，即“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确保皇帝的绝对权力，消除兵强马壮者即可为天子的隐患。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防乱。

军事改革针对两个方面：一是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将领；二是造成兵强马壮者即可为天子的军事制度。

对于功高的宿将，历史上的开国之主往往大开杀戒，以除后患。但太祖实行“杯酒释兵权”，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宿将解甲归田，同时赐予优厚待遇。从此，太祖放心地当起他的皇帝，老将们安心地颐养天年。

太祖以后周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身份夺得天下，深知其中的机关奥妙，立国后不久便废除了这个权力大得没边的最高军职，以及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将中央禁军的统兵权改由“三衙”——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分别统领，并另选一些资历较浅、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将领。

太祖另置枢密院，不统军，但管军队的召募、训练和调动。三衙统军，但无权调动军队，与枢密院形成相互牵制，便于皇帝操纵。

在军队的部署上，实行“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将全国约半数的战斗力最强的禁军调至京师及附近驻防，由皇帝直接控制。其他禁军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实行“更戍法”，每年或两年将禁军换防一次，但其统帅不换防，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不得专其兵”，防止武将个人势力做大。

实行国家募兵制，严禁地方擅自招兵。凡灾荒之年，朝廷都会招募饥民，防止流民造反。太祖对这项政策颇得意，说：“吾家之事，唯养

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

宋太宗赵光义对军事将领的控制更加严格，将军权抓得更牢。每次战前，他都会为出征的大将授以“阵图”，即作战方案，即使方案不符合实际，前线指挥官也无权改变。照着阵图，打了败仗，主帅责任不大；反之，不按阵图而打了败仗，则罪名极大。

行政改革亦沿着集权于上、分权于下的方向进行。为限制宰相权力，太祖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设为二府三司。最高行政机关称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合称东、西二府。最高财政机关设为三司。二府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对皇帝负责。

在中央朝廷与州府之间，增设路一级，设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等，代表中央监督地方州、县，将部分财权、司法权收归中央。

如此一来，军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中央朝廷，最高权力则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之手。

在制约武将的同时，太祖、太宗推崇文治，大兴科举，重用文人士大夫。北宋前期，枢密院长官尚有不少由武将充任，到仁宗时则基本由文臣把控。

营武出身的狄青屡立军功，仁宗准备提拔他为枢密副使，遭到言官反对。狄青进京赴任，被一些朝臣呼为“赤枢”（当时军人有“赤老”的蔑称）。西南侬智高反宋，仁宗令狄青、余靖统军南征。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取得宋自统一以后在边疆的最大胜利，被擢为枢密使。流言随之而来，有人称看见狄家的狗长出角来；有人发现狄青宅院在夜晚常发出奇光，而这种光亮恰与当年后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情景惊人的相似；还有人称，见到狄青在相国寺内身穿意义非凡的黄袄。宰相文彦博劝仁宗将狄青外放，仁宗说狄青是忠臣啊，文彦博反驳道，太祖

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狄青终于罢放陈州，不久郁郁而终。

与“文臣主枢密”相呼应，太祖令“文臣任知州”。太祖认为，文臣即便造反，危害也远小于武将，因此让文臣代替节度使出任地方一把手。

为强化文治，笼络读书人，太祖、太宗大兴科举，通过科举者即授官，科举入仕人数大大超过唐代。

宋廷还规定，武官的磨勘，即考课年限比文官更长，其升迁速度较文官缓慢。文官的福利待遇也比武将高，除去官俸，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厨料、仆人衣食等各样杂费，以及“职田”，即依官阶高下可得良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退休后还能享受较高俸禄。因此文臣不愿改任武官，武官则很难跻身文官之列。

太宗时，文官主政、重文轻武的局面基本形成。此后的历代君主均因循不悖。北宋被金人灭亡后，高宗赵构重建南宋，他本人一度被金兵穷追入海，惶惶不可终日。而一旦抗金形势转好，他便解除岳飞、张俊、韩世忠三大将兵权，并与秦桧一道残杀岳飞父子。重文轻武，严防武将，作为遗传基因，已深入赵宋王朝的骨髓。

但就防乱的初衷而言，宋初的改革相当成功，奠定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唐五代以至前代屡见不鲜的武将擅权、藩镇割据、权臣篡逆、宦官外戚之祸、大规模农民起义等，在两宋基本没有出现。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盛赞说：“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改革促进了新国家的稳定，稳定带来了繁荣。

太祖开国的头四年史称“建隆之治”，期间，国家兵马强壮、国库充裕、社会安定，中国历史达到了自唐开元盛世以后的又一强盛时期。在此基础上，北宋经济全面恢复，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城市经济

得到了空前发展。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感叹道：“公元 960 年宋代的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称：“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六百年……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使宋朝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内向与和平的特征。但繁荣与富足，常常唤起他人觊觎的野心，和平需要武力之盾，这个文治的王朝能够守卫和平吗？

### 三 军事积弱与国家的竞争

历代王朝无一例外都存在政治退化的趋向。开国之初，统治集团都会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社会趋于安定、富足。其后，国家治理能力不断下降，尤其步入王朝中期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出现所谓“中期问题”。

到仁宗一朝，北宋的问题已相当严重。

太祖杯酒释兵权，采取的是一种政治赎买之策。《宋史·石守信传》载，太祖同时开出优厚价码，对众将奖赏，并且推心置腹地说：“人生白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后来与辽、西夏媾和，宋朝均走的是“花钱买平安”的路数。宋廷上下由此产生了一种思维惯性，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花钱来解决。

为安排好功勋故旧，以及各国旧臣，太祖改革官制，采取官、职、差遣分离的办法，人为制造享受级别待遇却无实际岗位的官位，不断增加官员数量。真宗时实行恩荫任子，令“官二代”不用科举就能入仕，加之，本朝大兴科举，有名无实的冗官最多时达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七八以上。宋初，内外官员约五千人，四十年后的真宗景德年间达近万人。再过了四十年后，仁宗皇祐年间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这还不包括数

量庞大的胥吏。1063年（仁宗嘉祐八年），司马光在《论进贺表恩泽札子》中说，当时官吏“十倍于国初”。

僧多粥少，助长了钻营之风，为害政治风气。《宋史·鱼周询传》载：仁宗朝时，“仕进多门，人污政滥，员多阙少，滋长奔竞，靡费廩禄”。

宋初，禁军总数约二十万，由于大量招募流民，加之应付与西夏、辽的冲突，仁宗时，总兵力增加到近一百三十万，每年的军费开支达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为弥补军费的不足，宋军热衷于经商活动，或织布、烧炭、造船，或贩茶、售酒、卖药，或开旅店、租房屋、办典当，严重影响了训练与战备水平。

冗官、冗兵以及朝廷的各种赏赐、奢侈消费等，带来了严重的冗费问题。宋朝官员待遇优厚，士子一旦中举做官，生活就会极大改善。真宗的《劝学》诗称“书中自有黄金屋”，这绝非戏言。欧阳修在其《读书》诗中说：“官荣日清近，廩给亦丰羨。”不少官员锦衣美食，纳妾蓄妓，生活奢靡。宋人笔记《钱氏私志》载：仁宗朝，学士宋祁经常在府邸大开筵席，与宾客们欢饮达旦，其府邸被称为“不晓天”。他的哥哥、宰相宋庠派人送信教训他说：你烧灯夜宴时，还记得过去我们在州学吃斋饭的事吗？宋祁竟笑着对送信人说：回去问问宰相哥，当年我们吃斋饭是为了什么？

冗官、冗兵、冗费，史称“三冗”。宋初，国库每年收入二千多万贯，可结余大半。到真宗天禧末的1021年，国库每年收入一亿五千万贯，支出一亿二千万贯，尚结余三千万。再到仁宗时，财政已没有多少富余。

财政的亏空只能取之于民，横征暴敛在所难免，于是到仁宗朝中期，各地兵变、民变不断。1043年，欧阳修在《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说：“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

1043年春，京东路沂州饥民揭竿而起。巡检使朱进奉命带领虎翼

军前往镇压，一名叫王伦的军卒发动兵变，杀死朱进，占据沂州。义军随后南下转战江淮间，直捣扬州。同年，陕西大旱，商州农民在张海、郭邈山等领导下起义。驻守光化军的宣毅军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也兵变。兵变、民变队伍所到之处，州县官吏不是作鸟兽散，就是“金帛牛酒，使人迎劳”，甚至把兵甲作为礼物，让起事首领入主州县衙门。宋廷调重兵围堵、镇压，才扑灭王伦、张海义军。仁宗深受震动。

但，仁宗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还不在于内部，“两蕃”（宋人称辽与西夏为“西蕃”）才是他最大的心病。

中原王朝自古便面临北方马背民族政权的竞争。10世纪中叶建立的赵宋王朝，一举结束了晚唐、五代之乱。但10世纪亦是马背民族勃兴的世纪，辽、西夏强盛崛起，先后与宋朝爆发严重冲突。“三冗”中的两冗——冗兵、冗费，都与“两蕃”问题密切相关。

受益于文治，相比于辽、西夏、金、蒙古（元），宋朝堪称是文化超级大国，儒学、文学、艺术、史学、科举等均迎来了大发展，人才之盛亦前世罕有。欧阳修说：“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南宋朱熹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文化强，意味着民族生命力强，凝聚力强，正如马克思在论述中世纪印度史时所说的：“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与军事力相比，文化力对于国家兴衰治乱的影响毕竟间接得多，较高文明征服“野蛮的征服者”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11世纪中叶，北宋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是“两蕃”的武力威胁。

太祖主导的宋初改革在防乱上成效显著，但为本朝留下了一个长久的后遗症——军事积弱。

战争是指挥与协同的艺术，太祖实行的“更戍法”解决了武将擅权、谋取个人势力范围的问题，但严重干扰了军队的指挥、训练。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太宗遥控前线指挥，完全违背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的实际。

以文臣统兵，虽或有胜绩，但不符合战争的普遍规律。

地方实行的路制，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但地方权力被剥夺后，对内治安和对外边防能力均被减弱。

仁宗时，1041年二月，大臣韩琦慨叹宋军“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1044年六月，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比较辽与宋的国势后痛心地说：“北敌之强既如此，中国之弱又如此。”

南宋吕中评价宋与西夏的战事时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

北宋末，面对亡国之危，名臣李纲曾建言钦宗，要求恢复藩镇节度使制，加强地方武装，抗击金人南侵。

南宋孝宗时，朱熹知南康军，按规定，该军禁军应有一千人的编制，可实际只有二百人，且缺少军饷。《朱子类语》卷一二八载他的话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宋史·文天祥传》载，南宋末，面对元军的进逼，文天祥在上疏中痛惜地说：“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寝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中原陆沉，痛悔何及。”

宋朝军力削弱的同时，偏偏遇上强悍的对手。

安史之乱前，安禄山所统河北三镇兵在唐朝各镇中兵力最强，其主要任务就是防御东北的奚、契丹。这说明，那时的契丹，势力已相当强大。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中衰，契丹附于回鹘。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灭，契丹又附于唐。唐末，契丹实力上升，但仍为唐朝卢龙镇所制。五代时，中原王朝陷入混乱，契丹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916年，契丹大汗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之后便东征西讨，最西打到阿尔泰山一带，东面攻灭渤海国。耶律阿保机去世后，其次子耶律德光继位，国力达至极盛。先是，后晋石敬瑭为灭后唐，向他称“儿皇帝”，割让军事要冲燕云十六州，中原门户从此大开，契丹因为这笔飞来的横财，如虎添翼。石敬瑭病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对契丹主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三次兴兵南下，灭后晋。947年二月，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国号“大辽”。但耶律德光没有久据中原之志，不久撤出开封，率军北归。此后，辽人再也没能跨过黄河。

宋初，太宗两次北伐，试图夺回燕云，均遭失利。辽朝则时常南下骚扰。真宗时，辽朝大举南侵，双方打了个平手，于1005年年初签订“澶渊之盟”，宋廷需每年输出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自此，双方大规模战事停歇。

与辽朝相比，西夏的崛起对北宋的国运产生了更大影响。

唐末，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封夏州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五代十国时，中原内乱，定难军雄踞一方。宋初，拓跋部归附。太宗时，其首领李继迁起兵反宋。李继迁死后，子德明继位。德明与宋朝修好，向西击败甘州回鹘，国势日盛。德明死后，子元昊继位，于1038年十月称帝立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仁宗不予承认，下诏削元昊官爵，停止互市。1040年年初，元昊集兵数万攻延州，大败宋军于三川口，俘宋将刘平。次年二月，在好水川之战中再败宋军，宋将任福战死。1042年闰九月，元昊在定川寨之战中又取全胜，宋军葛怀敏

等十六将被杀。

宋廷大震，君臣一筹莫展之际，辽与西夏发生火并，天上掉下了馅饼。1044年五月，辽朝派军讨伐境内党项部的反叛，西夏施救，杀死辽朝招讨使，辽兴宗举兵十万伐夏。为避免两线作战，元昊主动向仁宗送表称臣，双方议和，北宋册封元昊为西夏主，岁赐“银、绮、绫、茶二十五万五千”，恢复边民互市。西夏取消帝号。不久，元昊率军击败辽朝大军，辽夏议和。

之所以说西夏对宋朝国运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宋辽之战从太宗 979 年第一次伐辽开始算起，到 1005 年澶渊之盟，前后只持续了二十六年，此后两国关系总体较好，未发生大战；而除去宋初的二十余年、德明当政的三十年以及庆历和议之后的二十年，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与西夏差不多打了一百年。名臣李纲曾说：“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由于对夏用兵之需，北宋将大量精锐部队部署在陕西前线，河东、河北一线的防御则严重不足。北宋末，金人南侵时认为宋朝“独西兵可用”，因而以完颜宗翰率一军围太原，取洛阳，断绝西兵东援开封的通道，短短两年便灭了北宋。

北宋对西夏用兵屡遭失败，除去战场上的因素外，还有若干其他原因：首先是地理环境对宋军不利。北宋出兵，一进入西夏便是广袤沙漠，交通、补给不便，难以久持；而西夏一入宋境，便可就地取材，补充军需。其次是西夏军机动性强，兵力容易形成局部优势。西夏全国的常备军约五十万，约十万部署在宋夏前线，且以骑兵为主，擅长运动、突击。北宋战时在陕北集结的兵力虽多达二十万以上，但防区广阔，驻扎分散。最后是辽朝趁火打劫，令宋朝无法倾力对付西夏。好水川之战后，辽朝向宋朝索要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宋廷不得不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换取辽朝放弃索地。

因此，在 11 世纪中叶，中国大地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

“新三国”局面。新三国与旧三国有很大不同。魏、蜀、吴三国无论哪国胜出，哪国失败，人们最多不过发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感叹；宋与辽、西夏分属不同民族，一旦宋朝失败，面临的将是灭族之危，后人对于北宋军事失败的批评也格外严厉。

在对峙与冲突中，两蕃显得异常强悍，原因在于，他们已经完成了“进化”。

自秦汉到隋唐，在与马背民族的战争中，由于人口、疆域与制度优势，中原王朝一直比较主动，特别是在汉、唐盛世，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西晋时即便发生了“五胡乱华”，但其起因并非是因为五胡的强大。五胡本是被压迫民族，长期生活在汉地，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残杀，使其镇压五胡的力量大为削弱，问题才由此发生。西晋灭亡后，中原王朝南迁建立东晋，北方陷入十六国的分裂，十六国中大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统治时间均短。南北朝时，南朝继承了东晋遗产，由汉人统治。北朝虽是五胡十六国的延续，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汉化，南北对峙最终以北朝的继承者——隋的重新统一而告终。

北宋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汉唐的主要对手是匈奴、突厥，但这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均属较松散的军事部落联盟，社会发展处于较低阶段。辽与西夏则通过大量借鉴汉人制度，“进化”到成熟的国家体制。《新五代史》载，耶律阿保机上台之初，在汉人建言下，以帝制取代契丹传统的军事民主制，为其立国、强国奠定了基础。西夏前期实行蕃汉官制，到中后期则全面采用宋制。辽、夏两蕃支持战争的能力远非匈奴、突厥可比。

汉唐王朝之所以能击败匈奴、突厥，得益于组建了强大的骑兵军团，其全盛时，骑兵数量和武器装备均占优，因此，汉将霍去病、唐将李靖才能运用大规模大纵深骑兵运动战，千里奔袭，直捣对方王庭。这种战例在北宋基本未见，原因在于，辽朝占据的燕云十六州，以及西夏

占据的河套地区，不仅是国防战略要地，而且还是汉唐以来中原王朝最好的牧马场。

辽和西夏不仅有骑兵之利，而且还学习汉人，建坚城深垒，依城防御，其攻守趋于均衡，不再是那种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队伍。979年，太宗亲征，围攻幽州，辽军死守待援，结果大败宋军于高粱河，太宗亦为流矢所伤。在1081年的灵州之役中，宋军围困西夏王都门户、军事重镇灵州，但久攻不下，最后反被西夏军所破，损失惨重。

汉唐国家与少数民族部落联盟的较量，到本朝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马背民族在个体军事素质上具有天然优势，一旦在国家制度层面获得进步，便有野心与中原华夏王朝开展全面角逐。

假如没有“两蕃”之患，“三冗”等内部问题尚可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逐步解决；“两蕃”问题的急促，令宋廷无暇专注于内部。政治改革由此激发。

邓小南先生在《王安石和他的时代》一文中指出：“宋代在被周边民族政权挤压的一个空间里，是如何对自己的发展做出选择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就宋代的历史而言，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宋代的内政选择是在外交压力下的选择。”

张荫麟先生在《两宋史纲》中专论“北宋的外患与变法”，认为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皆源于外患。

## 四 庆历新政，仁宗“拉抽屉”

国家出现问题，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其实都是常态，关键看统治阶级如何应对。并非所有王朝在中期以后一定就走下坡路，国家行将衰微之际，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王朝的“中兴”，统治阶层通过改革，缓解或解决了问题，扭转了国家颓势。汉宣帝刘询、汉光武帝刘秀、唐宣宗李忱等都是有名的“中兴之主”。

在西夏的军事重压之下，庆历年间，宋仁宗采取了政治改革行动。

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除前十三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外，实际执政近三十年，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后世一般认为，仁宗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但事实上，他的心路历程中也有试图更革的时刻。1043年（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因病辞相，仁宗令在陕西主持军务的夏竦、韩琦、范仲淹入朝。范仲淹拜枢密副使，七月，改参知政事，主持新政。富弼、韩琦拜枢密副使。

仁宗选中范仲淹，完全在朝野上下的意料之中。十八年前的1025年，范仲淹担任大理寺丞后不久便进呈《奏上时务书》，要求变革。次年，又在丁母忧期间“冒哀上书”，写下万余言的《上执政书》，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政”的主张。

范仲淹早年担任泰州兴化县令时，与泰州军事判官滕子京一道，带

领百姓修筑捍海堰，使沿海数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当地百姓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

范仲淹虽是进士出身，但时常留意军事，进士及第不久，他初任亳州推官，曾游历河朔，写下了著名的《河朔吟》，诗曰：“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袴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诗中提及的张良（字子房）、李牧、严尤均是赫赫有名的军事家，表达了他效命沙场的心愿。

1040年的三川口之战后，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于次年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执掌对西夏的战事。这一年，范仲淹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范仲淹赴任时，北宋前线重镇延州城周边的各要塞大多失守，范仲淹主动请缨，兼知延州。韩琦力主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反击，范仲淹则主张采“屯田久守”。夏竦采纳韩琦的意见，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与西夏军接战，再遭大败。范仲淹则率精锐秘密潜入西夏军驻地，筑大顺城，扭转了宋军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范仲淹还淘汰军中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从本地人中召募士兵，他们熟悉山川道路，又因保卫家乡，战斗意志较强。军中陆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一批杰出将领，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当时，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不是一位纸上谈兵的书生。

1043年九月三日，仁宗诏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到天章阁谒太祖、太宗御容之后，问策于诸大臣，要求他们“坐而书以对”。

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

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侵月削”，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并针对国家弊政，提出了十项改革建策，受到仁宗的首肯，下二府施行。

但新政类似于一场夏日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天章阁策对之前，仁宗并没有就改革问题展开任何讨论，一切来得都很突然。然而在短短的一年四个月后，新政便突然宣告结束。1045年正月，范仲淹罢参知政事，改革派全部被贬出朝。

庆历新政何以败得如此之快？

新政的十项改革措施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和均公田五项，均针对吏治，覃恩信、重命令两项亦与吏治相关。因此，庆历新政的核心与重点是吏治改革。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明黜陟”，即有大功大善者才能加爵奖励，不能到时就升迁；鼓励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干出实绩的，不受任官年限进用；“不堪理民者”，不予重用。

“抑侥幸”，即减少官员的恩荫名额，遇大礼只许奏请一子充任京官，如果是弟侄，需经考试录用。馆阁一类的重要职位，必须由两制（负责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和起草外制的知制造）考核进士任用。

“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制度，进士考试以策论为先、诗赋为后，诸科考试除了考儒家章句，更要考经书要旨。

“择长官”，即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等选荐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知州，再由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知州、通判选取知县，以确保地方官员的素质。这项改革是新政的重中之重。

“均公田”，即改革官员的职田制度。朝廷派人核查官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除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覃恩信”“重命令”，指定期派官员到各路检查各级落实朝廷法令情况，访贫问苦，取信于民；慎重制定法律，防止朝令夕改，一旦颁行，故意违反者，严加处罚。

在圈定全国监司名单时，范仲淹发现不合格的便一笔勾销，富弼提醒他：你一笔勾去容易，不知道被勾去的一家都要哭了吗？范仲淹则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新政很快遭致激烈反弹。

本朝无阉患，但朝中有不少衙门由宦官把持，富弼与韩琦商量，让他们三年轮换，久任的全部进行更换。于是，宦官们“恶（富）弼如枕干之仇矣”。

范仲淹派出转运按察使到各地督查，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如临大敌。

范仲淹上书的同一月，监察御史梁坚便弹劾他的老部下、知庆州滕子京，指控他在知涇州时贪污挪用“公使钱”（即政府的公务招待费，又称“公用钱”）。经过一番调查，梁坚所劾并非事实。但仁宗还是在次年初将滕子京贬官。

1044年四月，仁宗听到一些对改革派私结朋党的非议，向辅臣发问说：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称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支持范仲淹的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上《朋党论》，称君子有朋，小人无朋，要求人君“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但仁宗沉不住气，这年夏天，他向辅臣连发五问：西北到底应该由谁来镇守？为什么民力困弊、国家财力不足？为什么军队多而不精？如何处理武将、文臣不和问题？为什么躁进之徒仍在竞相奔走？

同年秋，进奏院案事发。进奏院官员苏舜钦是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女婿，由范仲淹举荐入朝为官。按惯例，进奏院每年春秋办赛神会时，将院内废纸变卖，换成酒钱，大家畅饮一番。当时，朝廷曾出台法令整治公款吃喝，但苏舜钦仍与右班殿直刘巽变卖废纸，邀来梅尧臣、王洙、王益柔等名士宴饮，席间还唤来歌妓助兴。太子中舍李定也想参加，苏舜钦鄙其为人，没有答应，他便向上举报。御史中丞王拱辰与革新派不和，授意苏舜钦的下属鱼周询、刘元瑜揭发。仁宗闻报后大怒，将苏舜钦削职为民，其余十一人全部被贬。

监察御史里行包拯于七月、八月间连上两疏，批评按察使“苛虐”，“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更有甚者，将京东转运按察使沈邈、薛坤的部属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四人称为“山东四伥”，将转运按察使王达、杨紘、王鼎称为“江东三虎”。仁宗下诏，要求约束诸路按察使。

不久，范仲淹被任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双双离开京师。

1044年十月，宋夏议和，西北军事威胁暂时解除，仁宗顿时失去改革动力。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次年正月，范仲淹罢职，贬官至陕西彬县，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等全部被贬出朝。

尽管庆历新政成效不显，但由于它施行时日尚短，引发的、留

下的后遗症也少。再者，新政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仁宗的反复，与范仲淹关系不大。与后来王安石变法引发巨大争议不同，新政失败后，朝中再也没有出现针对范仲淹的批评。

但庆历新政未能解决、缓解宋朝的内外危机，问题留给了后来者。

## 五 “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

一个王朝的发展轨迹很少是线性的，开拓之后，会趋于守成，守成之时既久，开拓的冲动又会萌发。帝王们的心态也常常如此。在庆历新政中铩羽的仁宗后来仍有重启改革的想法。

1048年三月，仁宗幸龙图、天章阁，召近臣、宗室观看太宗游艺集、真宗幸澶渊诗碑及三朝瑞物，并出手诏赐辅臣说：西北备边的巨大消耗，令公私匮，国家承平日久，人浮于事，各级官员、将帅难以胜任，是制度未立的原因？还是选人用人机制出了问题？

翰林学士张方平当天上书召对，提出减少冗兵、冗费的主张。仁宗看后很满意，赐“文儒”二字以示表彰。

御史中丞鱼周询也上书召对。

同月，仁宗再下诏说：“朕欲闻朝政得失，兵农要务，边防备御，将帅能否，财赋利害，钱法是非，与夫谗人害政，奸盗乱俗，及所以防微杜渐之策，悉对于篇。”

仁宗不同寻常地一月之内两次下诏求言，仿佛是回到了发动庆历新政的状态。但此时，朝中已没有像范仲淹那样的政治家。

宰相陈执中备受仁宗宠幸，但其并非进取之士。

张方平也未能进入仁宗的视野，八月，三司户部判官杨仪犯事降职，张方平受牵连，贬知滁州。

宰相文彦博因平定贝州王则兵变之功，刚刚由参知政事进为次相，亦无什么对策。

嘉祐是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自1056年至1064年，前后八年。这八年被认为是仁宗朝乃至宋朝治理最好的一段时期，史称“嘉祐之治”。嘉祐之治常被宋朝的后世君主拿出来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有“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之誉。

嘉祐之治是在仁宗的一场大病中开启的。1056年正月初一，因为在头天除夕，夜感伤寒，仁宗到大庆殿接受朝贺时一度昏厥。一个多月后，仁宗康复，但对政事不置可否。仁宗的身体欠安并未对国事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相反，按照宋人的说法，国家治理得相当好。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载：“帝自此御朝拱嘿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摇首。而时和岁丰，百姓安乐，四夷宾服，天下无事。”

只是，嘉祐之治这八年是仁宗生命的最后一站，他身体已不大好，将大小政事交给执政大臣，自己则看看书，写写字，吟诗作赋，宴饮垂钓。嘉祐之治其实就是无为而治，改革对于这位老皇帝的身体和心态，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但中下层士大夫批评时政、倡言改革的热情却日渐高涨。

事实上，从真宗朝开始，朝廷中就出现了各种关于改革的议论，而到了仁宗一朝，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

真宗初即位时，知扬州王禹偁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对辽夏“谨边防，通盟好”；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利”的税收；三是严格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五是“亲大臣远小人”，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认为，冗兵、

冗吏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1039年，西北战事吃紧之时，宋祁上疏，认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指冗官、冗兵、僧道众多；“三费”指寺观祈福之费、寺观设工徒役卒之费、节度使动用公用钱物之费）。宋祁认为，皇帝、后宫要带头节俭。此时的宋祁已四十出头，刚刚迁为天章阁待制、同判太常礼院，还不是十年后的那位沉迷于“不晓天”的宋大人。

1049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以国用不足为由，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均反对，说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相聚为盗。文、庞二人同奏说，现在公私困竭，就是因为养兵太多，万一归农的兵士聚为盗贼，二人愿拼死去镇压。仁宗采二人所议，下诏陕西保捷兵（禁军）年满五十岁以上和体弱者六万余人归农。但后来王德用为枢密使，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再增。

1058年十月，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写下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国事堪忧，认为症结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建议朝廷重视人才，改革科举、法度。

1061年，知谏院司马光向仁宗皇帝三上奏札，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提出裁减禁军、量材录用各级官员、减损冗费、节省财用等建议。

次年，苏辙作《新论》，称“天下之吏偷堕苟且不治其事”“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

朱熹在《朱子语类·自熙宁至靖康用人》中指出：“（王安石）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

南宋名士陈亮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

士大夫为什么纷纷主张变法呢？

首先，嘉祐之治下，国家治理存在很多问题，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人的改革书中多有论及。

其次，仁宗是个贤君，舆论氛围好，大家敢于提出改革的建言。

最后，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好，愿意为国家献计献策。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这个时候的士大夫有心忧天下的自觉精神，推动了政治革新，“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而钱穆所说的宋朝百年“养士”，须从五代、宋初说起。

五代所建立的国家，传位不到三代就改换姓氏，大都由武夫悍将篡夺，士人备受轻视、压迫。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五代幕僚之祸”中，历数各方节度使残害士人的暴行，并特别提到张式案。张彦泽任后晋章义军节度使，为政苛暴，掌书记张式多次进谏，张彦泽非常恼怒，拉箭射他，张式脱逃。张彦泽派人追赶，并嘱咐说张式如果不听从命令，就杀掉他，取他头颅来见。张式跑到节度使李周处，李周上奏朝廷，朝廷下令将张式流放到商州。但张彦泽一定要抓到张式，晋高祖不得已，只好将张式送还。结果张式被剖腹挖心，砍断手脚而死。针对这件事，赵翼说：“士之生于是时，繫手絆足，动触落网，不知何以全生也。”

残酷的政治现实锻炼出现实主义的政客，冯道堪称代表。他历仕五代，为十一个皇帝的重臣，居相位二十余年。在大是大非面前，这位老兄从不提早表态，永远跟着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冯道自称长乐老，在《长乐老自叙》中自得地说：称赞我的人，骂我的人，不知道谁多谁少

呢！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予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天下大乱、民命倒悬之际，让士人们忠于一家一姓，讲求气节，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但天下由乱兴治之际，士大夫如此的精神状态，定难以支撑起一个长治久安的新王朝。太祖敏锐地注意到了士大夫精神层面存在的问题，在力推军事政治改革、大兴文人政治的同时，将士风建设作为另一项重大的政治课题。

韩通之死为他提供了一次契机。

陈桥兵变之后，大军回师开封，太祖告诫诸将，要秋毫无犯，尤其不得加害公卿大臣，否则不容宽赦。大军和平地进入京师，几乎未遇抵抗，但其中有一个插曲。后周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当时正在宫中，闻讯后仓皇出宫，被太祖心腹大将王彦升发现。王彦升一路追击，一直追到韩通府上，将他杀死。这是陈桥兵变中唯一的流血事件。太祖感到不快，下诏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安葬。后来借故处分了王彦升。

宋朝建立后不久，昭义节度使李筠在泽州起兵反叛，割据山西的北汉主刘钧率军相助，派宰相卫融在李筠军中协调。宋军攻破泽州，李筠败死，卫融被俘。卫融不降，太祖令人把他拖出去斩首。卫融大喊：“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之死正其所耳！”太祖大受感动，将他释放，后来还任其为官。

《宋史·忠义传序》写道：“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谏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

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忠义传序》认为，士大夫忠义之气，到五代时消褪殆尽。太祖对韩通、卫融的表彰，表明了朝廷的导向，之后，直言谏论之臣不绝于朝，朝野上下“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五代陋习被彻底铲除。

太祖褒扬韩通、卫融，对养成士大夫的忠义之气起到了导向作用，加之宋朝倡行文人政治，抬高文人士大夫地位，经济上予以厚待，士大夫于是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在君王面前唯唯诺诺的奴仆，他们对政治充满热情，勇于任事，直言无忌，敢于担责，开启了一代新风。

士大夫倡言改革，也得益于庆历新政。新政历时仅一年四个月，不难想象，如此短时间的改革能给这个中期王朝带来多大的变化。新政的意义在于，新政之前，解决“两蕃”和“三冗”，是宋朝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新政之后，“两蕃”和“三冗”的解决之道——改革本身，成为了政治议题。

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并未消沉，相反，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意志更加坚定。1046年，他写成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抒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成为时代精神的点睛之笔。鉴于范仲淹对于庆历前后及此后一段时期士人风气产生的深刻影响，后世将11世纪中的五六十年间统称为“庆历之际”，大致包括仁宗一朝、英宗一朝直至神宗熙宁年间。这也揭示了王安石变法与庆历新政之间的渊源。南宋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中认为：熙宁变法是庆历新政的继续，如果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就不会有熙宁变法。

范仲淹于1049年正月出知杭州。在距离杭州东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鄞县，青年王安石正在那里做父母官。范仲淹与王安石的父亲王

益是同科进士，长王安石三十二岁。王安石得知范仲淹到杭州，三次给他写信，并特地到杭州拜访。1052年，范仲淹调任颍州，行至徐州时，与世长辞。正在舒州通判任上的王安石写下《祭范颍州文》，称他为“一世之师”。

## 六 王安石两上改革书

仁宗朝后期，最激烈的改革主张来自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写作的节点是王安石从地方官——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任上卸任，入京就任三司度支判官之时。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首先盛赞了仁宗的君德，说他有恭俭之德、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仁民爱物。之后，他话锋一转说，这本来应达到天下大治了，但“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惻惻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王安石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改革，而即使仁宗皇帝想改革，也做不到，原因在于，人才不足。他说：现在一路数千里大的范围，没有几个人能正确推行朝廷法令，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不可胜数。朝廷每下一令，用意虽好，在位者不能推行，泽加于民，小吏们缘之为奸，侵扰百姓。

针对人才问题，王安石提出四条建策：教、养、取、任。

“教”，即培养好人才。应普遍设立学校，严格挑选学官，教学内容

以“实用”为准则，造就有实际才能的人才。

“养”，即管理好人才。要“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增加官吏的俸禄，给予物质生活的保障，同时，明确官吏的行为规范，对违法者，绳之以法。

在论及“饶之以财”时，王安石指出：“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朝廷应通过发展生产、理财改革来增加财富，这样的话，即便提高官员俸禄，也不会伤及财政。

“取”，即选拔好人才。自下而上推荐、选拔人才，根据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官职。考察人才不能偏听偏信，而应察其言，观其行，试之以事。

“任”，即使用好人才。应用其所长，保持任职的相对稳定，让官员安心做事，做出成绩。

那么，不重视人才问题，不改革，结果会怎么样呢？

王安石警告说：“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后果非常严重，搞不好有亡国之祸。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的改革主张并不全面，主要针对用人问题，理财方面的言论较少，而且，其理财改革主张目的仅仅是为解决提高官员俸禄问题开药方，但其改革弊政的强烈愿望和不同凡响的理财思想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它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广为流传的一部改革书。

但王安石所论的用人问题，与现实情况看似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仁宗的作为其实可圈可点。

仁宗朝名臣辈出，有范仲淹、吕夷简、鲁宗道、薛奎、韩亿、杜衍、庞籍、吴育、包拯、孔道辅、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等等。后来的神宗、哲宗朝重臣王安石、司马光、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海、范镇、曾公亮、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范纯仁、刘摯等人，在仁宗朝也崭露头角。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为何就这个问题大发议论呢？

首先，王安石谈人才问题，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围绕改革问题提出的建策，即要想改革，必须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人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

其次，王安石认为的人才不足问题，是针对当时整个的官僚队伍特别是地方官员队伍而言。仁宗朝出人才固然是事实，但相对于庞大的官员队伍，杰出的人才仍是少数。真宗朝以后，科场流弊渐生，考试内容偏重文辞，选拔出的官员往往不擅实务，志大才疏。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均提出过改革科举和用人制度的主张，庆历新政也是以吏治为主要内容。王安石绝非以耸人之言哗众取宠。

最后，王安石心目中的人才还是经世致用之才。在写作万言书前后，王安石还写过一篇散文《读孟尝君传》。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以爱贤重才著称。秦昭王诱他入秦，并欲杀之。孟尝君让门客暗入秦宫，盗出狐裘贿赂秦王宠姬，获释潜逃。夜半至函谷关，追兵将至，又赖一门客学鸡叫骗开关门，最终脱险。这历来被传为美谈，但王安石认为，孟尝君养的全是些鸡鸣狗盗之徒，真正的人才反而不来了，否则，按照齐国的实力，有一个管用的就能制服秦国。尽管仁宗朝人才荟萃，王安石仍然认为，真正管用的人才不足。

正史里没有任何关于仁宗对王安石上书态度的记载。仁宗既没有表

示赞成，也未反对。

但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仁宗在宫中御池边举行御宴，赴宴大臣须自己钓鱼烹食，因此用膳前，桌上的盘子里先摆放了一些小球状的鱼饵。王安石没有钓鱼，却将盘子里的鱼饵吃了个精光。知道此事后，仁宗对宰相文彦博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误食一两粒鱼饵尚可，哪有把全部鱼饵都吃下去的道理！

按照这个故事的逻辑，仁宗对王安石的建言一定是持否定态度，试想，对一个人的人品都信不过，怎么会赞同他的主张呢？

但这个故事的可信度不高，原因在于，仁宗朝后期，王安石的仕途未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反而得到晋升。1060年四月，他被仁宗任为同修起居注。第二年六月，任知制诰，成为显赫的两制官员。

王安石是那种不轻言放弃的人，1061年，他再上《上时政疏》，继续鼓吹变法。

王安石说：自秦以下，享国日久者，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但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结果身遇祸灾，后悔都来不及。应“大明法度”“众建贤才”，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执政后期政事怠惰，大封宗室。他死后，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打了十六年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梁武帝萧衍是南朝梁的建立者，在位四十八年，晚年，他收留东魏叛将侯景，又想与东魏通好，侯景心怀不满，起兵叛乱，攻占梁朝都城建康，将梁武帝活活饿死。

唐明皇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执政后期宠幸杨贵妃，大用李林甫、

杨国忠，重外轻内，置十镇节度使，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王安石说：“《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的本意是说，吃了药后，心里不难受，疾病反而不会痊愈；服药后出现眩晕等症状，正是药物见效的前奏。王安石的意思是——国家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当下定决心，猛药去疴！

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相比，《上时政疏》言辞更激烈，批评更尖锐。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均属备受后世争议的皇帝，用他们来类比仁宗，胆量不可谓不大。

但仁宗仍然保持沉默。

王安石任知制诰期间，被临时差派，负责纠察在京刑狱。开封有一位斗鹌鹑的少年，不肯将自己的鹌鹑借给朋友。朋友仗着两人关系密切，不告而取，少年追上去把朋友杀了。开封府原判少年杀人偿命。王安石提出反对，认为按律，偷拿是盗窃，不告而取便是盗贼，追而殴之便是捕盗。虽然伤人致死，按律应无罪释放。开封府将案件提交到审刑院、大理寺裁决，结果维持原判。王安石拒不接受。仁宗下诏要他道歉，王安石拒不道歉。御史上奏仁宗，仁宗置之不问。

不轻易表态是仁宗一贯的风格。南宋陈亮在其《中兴论》中载：某次，有人劝仁宗要独断专行，仁宗回答说：你说得不错，但天下事的决策，不该都由我来做决定。如果都由我决定，决策对了还好，有一项错了，也难以修改。不如让大家来讨论决定，令宰相执行，如果实施的过程中天下人认为不便，则由台谏官员公开地直言其失，决策也容易更改。

从后来的结果看，仁宗的这种不轻易表态的态度，其实是保护了王安石，为他日后的变法预留了窗口。假如仁宗断然否定王安石的主张，

或者提出明确批评，以他的威望，神宗估计是不大会启用王安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宗对于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亦有育成之功。

王安石两上改革书，未见得提出了多么高明的方案，但强化了士大夫的改革意识。他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他在士大夫中的声望越来越高，“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

## 七 有志之士

王安石小名“獾郎”，多部宋人笔记记载了王安石与獾（獾是民间常见的穴居动物，四肢粗短而强健，善于埋头掘洞，性凶猛而机警）有关的奇闻。《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出生时，一只獾跑进了产房，然后不见了。《云麓漫钞》说他出生时，一只獾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人行道上。《铁围山丛谈》的说法是，一位异人到王安石家，识破了他为獾的真身。

另据《道山清话》载：言官李常上书批评王安石的理财之法“不由仁义”，神宗觉得有理。第二天上朝时，神宗逼问王安石说，按李常所奏，变法岂不是误了百姓？王安石垂笏低手，笑而不答，作怠慢状。神宗更加生气，又一次责问。没想到，王安石上前对神宗耳语了几句，神宗立马连连点头称“极是，极是”。李常百思不得其解，逢人便说，不知道王安石有什么狐媚迷魂之术。

在科学未开的古代，人们通常认为，像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一定具有某种神秘特质。有关獾的传说代表了人们对王安石个性的某种认知和想象。至于其中的隐喻是否指王安石挖了赵宋江山的墙角，就不得而知了。而有关王安石身怀狐媚之术、蛊惑神宗的说法，根本就是反对者无端的诋毁。就出身与早期的生活经历而言，王安石完全是一位常人。

王安石祖籍抚州临川，1021年生于距离临川不远的临江军。他的父亲王益是真宗大中祥符间进士，担任过建安主簿、临江军通判、新淦县知县、韶州知州、江宁府通判等职，属中下层官僚。王益育有七子二女，前妻谢氏早卒，生安仁、安道。续妻吴氏生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以及二女。王安石在众兄弟中排行第三。

王益是清官，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在临江军，他敢于打击地方豪强。知韶州时，当地人说，还没有出现过比他更贤能的父母官。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他后来回忆说：父亲在世时，我年龄尚小，对父亲为政的事迹还不够理解。但还能记得他的一些教诲。父亲的理想是要使天下人受益，即使是一家一户过得不好，他也觉得有愧于自己的责任。

如果说少年王安石与常人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他学习异常勤奋。

1030年，王益任殿中丞知韶州，王安石时年十岁，开始学习诗文。1033年，王安石祖父去世，王益举家回临川奔丧，十三岁的王安石第一次回到家乡。回临川后不久，王安石来到宜黄姑姑家，拜当地隐儒、饱学之士杜子野为师。在杜子野教导下，王安石学业精进。

传说有一日，王安石翻阅《开元天宝遗事》，得知李白梦见自己所用的笔头上长了一朵美丽的花，因此才思横溢，名闻天下。他问杜子野先生到底有没有生花之笔。杜子野说当然有啊！他随即拿来一大捆毛笔，说：这九百九十九支毛笔中有一支便是生花笔，究竟是哪一支，我也辨不清楚，你自己找吧。于是，王安石每天勤练文笔，等写到最后一支时，他顿时觉得文思泉涌，下笔如神，大喊道：我找到生花笔了！

另一则逸闻说，一日，王安石彻夜读书，恰巧这日清晨轮到他值日做饭，他慌忙到山下寺院借火，回来后，杜子野问他火从哪里取来，王安石说从寺庙取来。杜先生问：你桌上的灯不就是火吗？

王安石之所以勤奋好学，源于他内心的远大志向。《宋史·王安石传》中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古人一直很关注一个现象，为什么人的道路不同、命运不一？为什么一些杰出人物能够建立不朽功勋？古人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志。关于“志”，汉语中有许多相关的成语、俗语，比如：有志之士，雄心壮志，鸿鹄之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志者事竟成，等等。

当下我们常说的“信仰”一词是个外来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唐代的佛教经典中。古汉语中与信仰的内涵最接近的词便是“志”，有“志”便是有信仰。

古人十分看重志，肯定一个人，通常会说他自小就有远大志向。朱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又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史·文天祥传》载，文天祥很小的时候就倾慕乡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说长大了不能与他们同列，就不是大丈夫。

志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树立的人生理想与使命，有志便是有信仰，有信仰就会有动力，有动力便能引导行动，攻坚克难，完成使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通常被许多人引为思想消极的借口。但曾仕强先生的解释是：四十岁时对人生的目标不再动摇，五十岁时明白命运是自己造就的。这样的解释更符合孔子的思想行迹。他老人家五十四岁时才开始周游列国推广仁政，走了十四年，历经千辛万苦，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没有坚定的志向，这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王安石在家乡守孝期满后，随父至京师候命，第二年王益升任江宁通判，王安石又寄居江宁。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王安石一家在江宁的生活刚刚安定，王益便突然病亡，他为官清廉，无田无产，一家人顿时陷入困顿。苦读三年后，庆历二年即 1042 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初任签书淮南判官，步入仕途。

王安石初仕淮南三个月后，告假回乡，看望祖母，并迎娶表妹吴氏。这一次省亲，距离他上次回乡已过了十年。王安石写下《忆昨诗示诸外弟》诗，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诗中写道：“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睎。”

“稷”是传说中的五谷之神，“契”是传说中的商族始祖帝喾的儿子、虞舜的大臣，曾帮助大禹成功治水。少年时代的王安石便立志要像稷、契一样，造福苍生，流芳百世。

王安石的诗文中不乏有关志的内容。

1050 年夏，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后入京，顺道回临川探亲，途经越州，写下《登飞来峰》诗，诗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以此表达登高望远的志向。

1054 年三月，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届满，在京候差期间，返回安徽与两个弟弟王安国、王安上及友人同游褒禅山，写下著名的《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其孰能讥之乎？”

畏惧困难与艰险，是一般的人情，因此，平旷之处游者众，险远之地至者少。而世界上奇伟、非常之观，常常在于险远，人们很少能到那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一个人有志于非常之观，便不会随便停止，可是能力不够，也不能到达。

一个人有志，有能力，不懈怠，可是想去的地方幽暗昏惑，没有可以借助的照明工具，同样不能到达。

但有能力却没有到达，别人会嘲笑，自己觉得后悔；尽了自己最大的力而不能至，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游褒禅山记》与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之间有某种深层的契合。《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出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游褒禅山记》则更进一步地阐明了志向、使命与能力、行动、条件的关系。如果说《岳阳楼记》树立了理想旗帜，那么，《游褒禅山记》更像是行动指南。

《游褒禅山记》亦勾画出十五年后王安石施行变法的心路历程——志之所在，虽万仞之山，无所不上。

## 八 治州县，不为俗吏

宋人笔记《默记》载：按照科举考官们原本的意思，王安石应该排第一名，王珪排第二，韩绛排第三，杨寘排第四。仁宗审定时，发现第一名的卷子中用了《尚书》“孺子其朋”的典故，认为是忌语，将其划掉。仁宗又看第二名的试卷，认为不错，但按当时的规定，已有官职的人不能当状元，王珪在职，也被划掉。第三名韩绛也在职，仁宗于是钦点第四名杨寘为状元。

依本朝惯例，进士考试中取得较高名次，通常是前五名的，在外地任职期满一任后，就可进呈著述，申请京中馆职（馆职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官之统称）。馆职是跻身高级官员的捷径，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都会循例申请，王安石虽具备条件，但从未提出过。

王安石在签署淮南判官任上届满，被诏回京师，任大理评事。1047年年初，二十七岁的王安石改任两浙路明州鄞县知县，七月，到达鄞州，独当一县。

王安石初任的签署淮南判官一职是州府长官的幕僚，主要是抄抄写写一类工作。知县则是一县主官，凡行政、财政、司法、治安、民政、教育、民俗教化等都在其职责范围。这是王安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考。

本朝县的长官称县令。遇有繁难大县，皇帝有时直接派京官带本官去掌管，有别于县的本官县令，称“知县”。县官三年一任，由吏部四选负责选拔，人选以进士出身为主，凡恩荫补官的，须经基层历练、考试、上级长官保荐等，才能任官，入粟补官者一概不许充任。而未担任县官的，不能升迁为知州、通判等更高级别的地方长官。

县官是亲民官，大小事务须亲力亲为。宋初，太祖集权于上，削弱地方，地方赋税除小部分作为地方必要的开支，大部分由中央掌控。县官不仅要对上级知州、通判负责，还要接受“监司”的考核监督。因此，县官被许多士人视为畏途，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县官长时间空缺无人履职的现象。

鄞县是明州治所，地处东南沿海，五代十国时，吴越曾在此屯军，修筑过一些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大都淤废。此地虽有鱼盐之利，但久旱少雨，百姓时有饥荒之虞。

十月，王安石致信两浙转运使杜杞，表示要“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使有所蓄，可以无不足水之患。”十一月，他从县城出发，历时十一天，跑了东西十四个乡，考察水利。农历十一月的鄞县已入冬，天寒地冻，王安石此行跋山涉水，栉风沐雨，行程密集。

王安石惜字如金，却在《鄞县经游记》中详记了这次考察全程，明人茅坤点评此文时感叹说：“县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此次出行后，王安石利用农闲，很快组织十万民工，建造海塘，疏浚东钱湖，外捍海潮，内蓄淡水，解除了困扰乡民多年的水旱之苦。

鄞县号称“大邑”，但民生维艰。在青黄不接、饥寒交迫时，许多乡民不得不以田地作为抵押，向豪强借贷，遭受高利贷盘剥，以致失去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一旦失去，便失去生存的依靠。到任鄞州的第二年春季，王安石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乡民，约定秋收后，加

二分利息连本还清。这个做法一举两利，既帮乡民度过春荒，又使官仓的陈粮换成新粮。

1047年三月，因久旱无雨，仁宗下诏令中外官员“共指当世切务，实封条上”。王安石应诏向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马遵写信说：家要富，得资产于国；国要富，要靠天下的财富；天下要富，必靠天地之财。他打比喻说，不出门外广求财源，而在家门内与其子交易，即使把儿子的财富全得到也不能富。这是王安石早年的一篇专论财经问题的文章，茅坤点评说：“论理财是荆公本色。”

宋朝实行盐茶专卖，严禁私人煮盐，但浙东路不少百姓为生活所迫仍铤而走险，偷煮私盐。1049年，浙东转运司下文，要求所辖各县吏民定期交钱，悬赏揭发私自造盐、贩盐的人。接到公文后，王安石致书两浙转运使、右司谏孙甫，提出反对。王安石认为，鄞县百姓缺钱，许多人只能靠卖田交钱。官府奖励相互告发，这是“重告讦之利以败俗，广诛求之害，以失百姓之心。”专卖制度表面上使朝廷得利，实际令下面的百姓受损，上面也无从真正得利，结果公私皆困。

王安石深感当地的教育文化落后，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移风易俗，于是他首创县学，邀请邻县慈溪的饱学之士杜醇充当教谕。

鄞县成为王安石的改革试验田，他的理财思想也在这时萌发，熙宁变法中实施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科举改革等，都有他治鄞县的影子。《邵氏闻见录》载：“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治鄞县给予了王安石经验与信心，他以民生为念，勇于改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考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并且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他离任后，鄞县百姓集资为他修建祠庙，

即使在后来朝廷发起清算王安石的运动，祭祀活动仍不绝，一直延续至清代。

《鄞县志》记载了撰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的一段话，对王安石治鄞县给予了极高评价，其文说：“故相国荆文王公，庆历中尝以廷尉评事来为鄞令。于时，年甚少，气甚锐，而学甚富，其志意之所存远矣。蕞尔一邑，固区区者，宜若无足以为。而公初无不屑之心，日夜惟以为民兴利除害为事。跨今盖一百九年矣，而其所兴造之迹尚班班可考。遗民子孙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

返回京师后，王安石被授为殿中丞。1051年，朝廷特赐召试甄擢，王安石一再推辞。不久，外任舒州通判。

舒州是大别山区一座环境清幽的山城，这里为春秋时期皖国封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王安石深入各地体察民情，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高峰。

在《感事》诗中，王安石写道：“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

在《兼并》诗中，王安石分析民生凋敝的原因：“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辙晚年时指责这首诗为“诗祸”，认为王安石“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青苗法实行后，“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足见这首诗在当时的影响。

数月后，欧阳修又荐他充馆职，朝廷要他召试赴阙，他上《乞免就试状》谢辞。

1054年三月，王安石舒州任满，回京除集贤校理，他再次以“家贫口重”为由，四次上书力辞。朝廷改任群牧判官，王安石仍力辞，后在欧阳修劝诫下，接受任命。

群牧判官负责全国马政，待遇优厚，王安石心有他属，不断向朝廷上书，终于在1057年七月，出知常州。

常州属两浙路，地处全国最富庶的太湖地区，物产丰盈，是漕运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对支持京师用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长八百里，从春秋、秦、汉陆续开凿，至隋炀帝时改进扩大，全线开通，成为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南北航道。但常州一带地势复杂，高低不平，加之河道日久淤塞，水流不畅，既影响漕运，又极易引发水患。

王安石到任不久，即从所辖各县调集民工，疏浚境内运河。司马光之兄司马旦时任宜兴县令，受常州管辖，他极力反对开浚工程，认为劳民伤财。此时，恰逢秋雨连绵不断，督工者纷纷托病不就，夫役叫苦不迭。王安石只好宣布停工，开浚运河一事，就此作罢。王安石本想在常州久任，但不到一年，1058年二月便被调往饶州，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1058年十月，王安石接到调他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的诏令，他上书宰相富弼，请求到州郡为官。富弼没有理会。

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写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朝野引起震动。这一时期，王安石还写了著名的咏史诗《明妃曲》，诗中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认为，失去宠爱的阿娇留在宫中，还不如远嫁的王昭君。其深意在于：如果不受皇帝赏识，即便身处朝堂，也无异于被贬他方。这或许可以用以解释王安石长期谋求外任的原因。

宋朝地方官三年一易，任满即调离，加之实行回避，本地人不许在本地当官，因此，宋朝没有真正的“地方官”。三年一易固然有利于防止官员结党营私，却引发了一个制度性问题——官员们难以真正熟悉一方。

王安石入仕后长期在江南地方为官，从幕僚当到知县、知州，再到路一级的监司长官，有了解地方，熟悉基层的考虑。王安石后来也在中央朝廷的多个衙门工作，成为深谙中央、地方政府运作的高级职业文官，这为其日后晋身王朝的政治中枢准备了条件。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 九 有志者得志

有志之士不一定就能“得志”，他还须具备得志的条件。以宋朝为例，士子必须首先参加科举，考取功名，进入仕途；然后还要有人荐举，以利升迁。

荐举制是宋朝的一项重要选官制度，涉及官员差遣、考核、升迁等。在文官体系中处于初等序列的判官、推官、司理、司法参军等属官，以及知县事、县令、主簿、县尉等县级官员，统称为“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选人只有升改京官后，才能得到升迁中高级官员的机会。不能顺利改官，老死于选人者，比比皆是。而改官，必须通过高级别大臣的荐举方能实现。

太祖、太宗朝，荐举范围主要是幕职、州县官，到真宗朝后，台谏官、学官、武官等均纳入，成为一项常设制度。庆历名臣范仲淹便是在宰相王曾、枢密使晏殊的荐举下入职秘阁校理，成为清耀的馆阁之臣，逐步进入中高级官员行列。

首先极力举荐王安石的大臣是文坛领袖欧阳修。

欧阳修本不知王安石其人，他的学生曾巩屡次说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二人是同乡，两家还是姻亲。1042年，王安石顺利登第，曾巩名落孙山，再考仍不中，于是上书求教欧阳修。欧阳

修看了曾巩的文章，认为像“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与之结为师生关系。

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两年后，曾巩取道滁州拜谒他，并专门带去王安石、王回等人文章，请欧阳修品评。

1054年，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赴京，听候差遣。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力荐王安石任集贤校理一职。按规定，馆阁之职须经考试任命，由于欧阳修力荐，仁宗决定免试直接授予。但王安石想继续做地方官，力辞不就。后改任群牧判官。

1056年，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中对知池州包拯、知襄州张瑰、崇文院检讨吕公著和王安石大加褒扬，举荐说：“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不久，欧阳修又上《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荐举王安石、吕公著任台谏之职，说：“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时才，曾召试馆职，固辞不就。”朝廷欲重用二人，但王安石却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由推辞。

也是在这一年，欧阳修、王安石终于第一次相见，欧阳修四十九岁，王安石三十五岁。欧阳修时任礼部尚书、权知审刑院，王安石为群牧判官。欧阳修见到王安石，喜欢得不行，他在《赠王介甫》诗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欧阳修把王安石比作李白、韩愈，认为后人无法超越。但王安石在《酬永叔见寄》诗中作答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说自己不愿做韩愈那样的文学家，而是希望追循孟子，以仁义之道匡时济世，表达了更为远大的志向。

次年，王安石改知常州，欧阳修亲自为他饯行。这年秋天，欧阳修

致书王安石，表达了“自拜别，无日不瞻企”的思念之情，并向王安石推荐吕惠卿。此后二人不断有书信联系。

宰相文彦博也做过王安石的荐主。1051年春，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回到京师。文彦博在五月的上疏中向仁宗推荐王安石说：“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后王安石辞试馆职，授为舒州通判。

王安石任群牧判官时，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荐主——世家子弟韩维。

宋人笔记《石林燕语》载：王安石任职群牧司时，吴充与他同僚，韩维任馆职，三人关系很好，“无日不过从”。他们相约，每一两月便一块去洗澡。吴、韩二人每次还给他准备新衣服，王安石洗完后见到新衣服就穿，也不问这衣服到底是谁的。

韩维来自显赫的韩氏家族。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说：做大官的，不是姓韩的，就是姓吕的。韩氏家族的族长是韩亿，他是真定人，科举及第后被宰相王旦召为快婿，官至大理寺丞、参知政事。韩亿教子有方，八个儿子都做了朝廷重臣，其中，第三子韩绛、第五子韩维、第六子韩缜先后做到宰相。世人把韩亿与他的这三子称为“四韩”。与“四韩”并提的是“三吕”，即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父子。吕氏家族祖籍山东莱州，吕夷简的伯父吕蒙正是太祖朝宰相。吕夷简在仁宗朝三度拜相，他的次子吕公弼官至枢密副使，另一子吕公著在哲宗朝做到了宰相。

韩维以父荫为官，欧阳修举荐他知太常礼院，1059年出判泾州。又回京任淮南郡王府记室参军，当淮南郡王的老师。这位淮南郡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的神宗赵顼。王安石后来得遇神宗，便是由韩维举荐的。

从嘉祐三年（1058）十月任三司度支判官，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近五年间，王安石回到京师任职，延续了与韩维的友谊，因他与韩维、司马光、吕公著交往密切，被时人称为“嘉祐四友”。

《宋史·王安石传》称，王安石进京时，因为没有家族背景和政治根基，有意通过结交韩氏、吕氏兄弟，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和赏识。

韩维确实为王安石步入朝廷中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王安石在嘉祐年间便能预测这些交友若干年后有益于仕途，显得牵强。众多史料显示，“嘉祐四友”中，王安石的才华最为突出，名声最大，为众人所折服。实际的情况，或许不是王安石有意结交韩氏、吕氏兄弟，而是韩氏、吕氏兄弟有意结交王安石。

1060年，仁宗同时任司马光、王安石同修起居注。二人均力辞不受。王安石上章请辞七次，不肯受命。司马光也先后辞了五次。仁宗不许，二人只得受命。嘉祐年间，官员辞官已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独特的官场文化。仁宗对辞官行为暗含鼓励，目的是想激励辞让士风，反对“奔竞”、跑官恶习。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司马光说：“王安石文辞宏富，当世少伦，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职，犹恳恻固让，终不肯为，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安石，相去远甚，乃敢不自愧耻，以当非常之命乎？”又说：“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司马光以才识不如王安石为由辞官，足见王安石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至于王安石为何与韩氏、吕氏兄弟交好，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王安石与韩绛、韩缜、吕公著是庆历二年（1042）的同榜进士。唐宋时，科举同时及第的称为“同年”。宋人有强烈的同年观念。宋初名臣柳开在给同年李巨源的信中就说：“同时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当然，同年只是为相

交提供了条件、契机，真正要成为好友、知己，还需彼此性情相投，心意相通，相互欣赏。王安石先是与韩绛、韩缜交好，继而与韩维结成挚友。

今天的成功学认为，一个人如果在人生、事业上屡遇贵人，说明这个人不仅学识与能力有过人之处，而且情商很高。王安石后来位极人臣，并不偶然。

## 十 新君的困境

1067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正月初八，英宗去世，其二十岁的长子赵顼即位，是为本朝第六任皇帝神宗，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年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距离北宋灭亡的 1127 年恰好六十年，一个甲子。

英宗即位时身体便不大好，在位四年后便驾崩。人们还来不及看出他的政治抱负。

但，神宗是一位很有想法的新君。

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载：神宗少年时，“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一天，他穿着金甲，全副武装，来到慈寿宫，对太皇太后曹氏说，娘娘看我这身装束好看吗？曹后迎笑道：你披甲甚好，但如果你都要穿上这一身，国家将危险到什么程度啊！听了这话，神宗“神庙默然，遂卸金甲”。

太祖曾计划在宫中设封桩库，存一笔钱，向辽人赎买燕云十六州，如辽人不卖，就拿这笔钱雇佣军士，武力夺回。因种种原因，此议未能实施。神宗却一直挂怀。

1078 年（元丰元年），神宗在内府中设三十二个专库，积蓄拓边专

款，每库以自己所写的一首诗的三十二个字分别命名。诗云：“五季失固，猗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意思是，五代丧失幽云边塞，北方夷狄肆意侵扰。太祖建国，有收复失地之志。设立内府，积蓄招募将士的经费。曾孙我要守护它，岂敢忘记先祖遗志？

神宗心中榜样是太祖这样的创业之主，有富强国家、制服两蕃、恢复汉唐疆土的雄心。

雄心来自雪耻的抱负，长久以来，神宗的内心一直蛰伏着屈辱感。《宋史·神宗本纪》的“赞”词中说：“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宋史·林广传》在其“论”中说：“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革之日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缗帛以成和好。神宗抚承平之运，锐焉有为，积财练兵，志在刷耻。”

辽朝自唐末五代以来便称雄北方，夺取燕云十六州后，形成对中原王朝的战略优势。宋太宗两次北伐失利，对辽采取守势，局部战争少有胜绩，后来的澶渊之盟虽换得了和平，但留下了“城下之盟”的话柄。

如果说对辽作战的失利还情有可原的话，对西夏用兵的数次惨败，则令宋朝颜面尽扫。庆历年间，宋夏之间虽签订合同，但双方之间仍极度缺乏互信，摩擦不断。1064年，元昊之子夏毅宗李谅祚遣使祭吊仁宗，并贺英宗继位。双方因礼仪问题发生口角，谅祚认为受辱，于同年秋发兵攻宋。仅仅因为外交使臣的几句口角，西夏便再动刀兵，足见其对宋朝的不恭。

神宗即位后不久，宋廷与西夏又围绕横山之民问题发生齟齬。西夏好战，宋夏交界的横山地区的吐蕃、羌族等少数民族常常被征调去做炮灰，引起他们不满，准备归顺宋朝。西夏主谅祚于1067年六月下令将

横山地区各族全部迁徙到兴州。北宋青涧守将种谔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人前去招纳，于是横山各部首领朱令凌率领所有居民投降了种谔，宋朝立即下令分给横山各族人民土地、住宅。谅祚向宋方交涉，被种谔强硬地驳回。

制服两蕃尤其是西夏，成为神宗的首要目标。

在后来的熙宁变法期间，神宗与王安石就两蕃问题频繁交换意见。王安石对神宗说：“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并鼓励神宗说：现在中国地广、民众，而四夷皆衰弱，这是数百年来没有的情况，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久为夷狄所侮，上天特意把制服夷狄的机会授予陛下。

儒家是道德主义者，法家是功利主义者。神宗崇尚法家，追求功名，欲励精图治。还在东宫做太子时，神宗便表现出对法家人物的兴趣。1065年十月，他拿出新抄录的《韩非子》让府僚校对，侍读孙永说：“韩非险薄无足观”，神宗搪塞说：只是为藏书而已，并不是爱看。即位后，神宗才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宋朝事实类苑》载：元丰中，神宗与辅臣论及人材时说：“人材固有小大，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齐，商鞅之于秦，吴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若于道，则未也。傅说之于商，周公之于周，可谓尚道德，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

制服两蕃，有赖于建立一支强大能战的军队。而建设一支强大军队，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

那么，神宗有这个家底吗？

实际的情况是，朝廷非常缺钱。

仁宗朝后期，国库收入与支出大体相抵。

英宗时，财政状况恶化。1065年（治平二年），财政收入一亿

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贯，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贯，非常规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贯，财政赤字达一千五百余万贯。可以说，神宗继承了一份负资产。

财政状况如此糟糕，如何强兵？如何打仗？事实上，神宗后来力主的变法，用意十分明确——为用兵找钱。

神宗即位的第三天，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张方平便来告急说：太祖、太宗平天下时，收敛各国财富，藏之内府，留下了丰厚的家业，但自从仁宗康定、庆历以来，因用兵之需，内府百年积累为之一空。节用是当今的急务。

但神宗一上来就面临花钱问题——行新君登基之赏，并且为其父英宗建造陵寝。

神宗的老师、太子右庶子韩维进言提醒说，鉴于财政困难，赏赐臣下，以及建造英宗陵寝，均不能过于奢侈。

根据常规，新君继位须恩赐宗室子弟及近臣，神宗不能例外，但恩赐减至以前的三分之一。

先前，由于英宗不是仁宗亲生，英宗对仁宗陵寝的建造格外用心，搞得十分隆重，工期用去七个月，用工四万六千七百人，耗银五十万两、钱一百五十万贯、绸绢二百五十万匹，还赏赐诸军近千万贯，总耗费几乎占用北宋财政年收入的一半。神宗是英宗的亲子，没有格外用心的压力，他派东宫旧臣、权御史中丞王陶到河南府亲自督办，并赐手诏要求凡事须节省。尽管神宗亲自发话，但一班人等岂敢怠慢？减来减去，役卒人数最后也达三万五千人之众。

神宗急于拿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逐一与朝中元老及各路大臣谈话。

朝中人才济济，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曾公亮、吴奎、

赵抃、唐介、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等等，均称誉士林。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国家缺钱是因为花钱太多，新皇帝要抑制个人欲望，少修楼堂馆所，裁减冗员、冗兵，停止与两蕃的战争，国家开支减少了，钱就够花了。

那如果两蕃入侵呢？这些大臣则回答说：只要内修德政，外睦邻邦，人家是不会打过来的。

一轮谈话过后，神宗发现，他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缺钱，而是缺人，他急切地需要一位力行改革、帮他找来钱的能臣。

饮誉西方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凭借其 1915 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一书，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韦伯在该书中也说：“变法的重点是军事财政”“当时帝国正面临北方蛮夷入侵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王安石试图通过一场理性的改革，为建立一支应付自如的能派上用场的军队创造资金条件。”

## 十一 当改革之君遇见改革之臣

然而此时，朝中并无用能臣、革旧制的共识。仁宗晚年无子，一直为立嗣之事纠结，吴奎是少数几个上疏力谏仁宗立宗子为皇子的大臣之一，神宗因此认为他“辅立先帝，其功尤大”，即位后便重用其为参知政事。吴奎的进言是：应对民困财乏问题，要顺其自然，帝王的职责是辨忠奸，用君子，让各级官员发挥作用，国家自然会大治。

若在太平盛世，吴奎的看法并无问题，但神宗面临的绝非这样的局面。所谓君子小人之辨，完全是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对于实际的用人问题于事无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说得清吗？

满朝大臣中，唯一能理解神宗的，恐怕只有韩维。

早在仁宗朝后期，韩维便做了神宗的老师。1063年五月，十五岁的神宗初封淮阳郡王，次年，英宗即位，神宗继封为颍王，韩维均侍奉左右。韩维对神宗的管教严格，神宗对于这位老师也极为尊重。《邵氏闻见录》载：“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韩维不仅管神宗的学习，还管他的品行。

为解新君之忧，韩维举荐了赋闲于江宁的王安石。

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吴氏在京去世，王安石去官，奉母灵柩归江宁，与其父合葬。服母丧三年后，王安石继续留在江宁讲学，收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为弟子。英宗屡召他赴京，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悬辞。

王安石放弃朝廷征召的原因，写在他在江宁时所作的《古松》诗中。诗曰：“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诗表达的意思是，高大的古松乃自然之造化，假如庙堂之上缺乏这样的栋梁，就尽管来伐取吧。但如果不是良匠，就不要糟蹋这珍贵的材料！

神宗问：王安石现在哪里？

韩维说：在江宁。

神宗问：朕召他，他肯来吗？

韩维说：王安石志在经世，非甘心老于山林，若陛下以礼致之，安能不来？

神宗说：卿可先给王安石写信，说明朕意，随后便召他。

韩维说：这样啊，王安石必不来。

神宗问何故。

韩维说：“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

神宗与韩维的以上对话说明，韩维对王安石的个性、志向、心态了如指掌，并且通过王安石之子王雱，与王安石保持着热络。韩维不仅推荐了王安石，而且断定王安石能应召，前提是，这个人有点傲气，“以

道进退”，皇帝你要“以礼致之”。

神宗对王安石并不陌生，韩维讲课，每次得到神宗嘉许，都要露出神往的口气说：这不是我的想法，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

神宗答应了韩维的要求，召王安石入京。但王安石仍旧婉拒，理由是，生病了。

神宗忙召问执政大臣说：王安石是先帝的大臣，先帝请不动，我原以为是他态度不恭。现在又请不来，是真的病了，还是要提什么条件？

宰相曾公亮说：王安石文才、学识、品德俱佳，应该大用，屡召不起，肯定是身体有病，他不会欺罔陛下。

吴奎却说：臣曾与王安石共事，此人有错不认，刚愎自用，主张迂阔，一旦受重用，必定紊乱朝纲。

神宗还是认为韩维说得对——以礼相待，既然病了，就先不要跑那么远，令改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大臣们都觉得王安石还会推辞，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这一次却应诏出任。

王安石感觉到了神宗的诚意。君子待时而动，蓄势待发。王安石并非不想回到朝廷，自小便以父亲为楷模，“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只是觉得时机一直未到。现在，“良匠”出现，时机已到。

王安石很快又奉诏，1067年九月，入京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成为大行皇帝的近臣。

宋袭唐制，设翰林学士院，负责起草朝廷制诰、敕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侍奉皇帝出巡，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学士中资格最老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其下称翰林学士、知制诰。宋朝的馆职包括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直阁、校理等，能入馆职的，均是诗坛、文坛的大才子。馆职通常晋升为修起居注官，包括直馆、直院及修撰。再往上便是

知制诰，最后才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号称“儒生之至荣”，有“储相”之称，这样的安排，足见神宗对王安石的用心。

次年即1068年，神宗改元，称熙宁元年。四月初四，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二十岁的神宗与四十七岁的王安石第一次见面。

神宗心情急切，一上来就问：要大治天下，应当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道：“以择术为先。”治天下，第一位的是要选择正确的策略。

神宗又问：唐太宗怎么样？

唐太宗是帝王中的佼佼者，踌躇满志的神宗认为，以唐太宗为榜样，志向已算是很远大了。不料，王安石语出惊人，他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怎么能只做唐太宗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后世学者不能领会，以为高不可及。

对于王安石的这一回答，后世有许多人认为他狂妄无忌，大话欺人，蛊惑神宗。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神宗》中就说：“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但哲学家贺麟先生不这么认为，他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文中说：王安石的话其实是他多年来怀抱的根本主张，神宗憧憬汉唐现实政治，而王安石“要把神宗转变为趋向三代伊周式的理想政治”。

神宗接着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安石没有详细作答，不久，他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出书面报告。

王安石说：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我因为浅薄无知，错蒙皇上询问，由于时间

紧迫，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告辞退朝。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

王安石说：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详尽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指挥任命，一定做到人尽其才，设置变革措施，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能够驾驭将帅，练好兵卒，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对内靠他们平定动乱。于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自身俭朴，为天下做出了榜样。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时，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为准则。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到了仁宗、英宗，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缘故。

王安石高度赞扬了仁宗的政治美德，说：仁宗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天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刑罚轻缓而公正，赏赐很重而守信用。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而不会受到偏见、谰言的蒙蔽。从监察官吏到州、县的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来损害老百姓。从县令、京官，到监司、台阁，虽然不能全部称职，然而闻名一时的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驾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如同死去父母。

接下来，王安石指出了当朝的六大弊政：

一是君主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因循守旧，一切听任自然，主观努力不够。

二是在吏治方面，单凭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士人，缺乏通过学校教育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朝廷中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官位，地方则频繁地调动迁官，缺乏考核实绩的制度，夸夸其谈的人能够

乱真，结党营私的身居显要，奉公守职的人无法被重用。

三是在农业方面，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遇到灾荒也看不到朝廷的救济抚恤，又不设置官员，组织他们兴修农田水利。

四是在军事方面，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没有加以整顿，又不能替他们选拔好将领，让他们长久地掌兵守边，保卫都城的都是些兵痞无赖，没有彻底改变五代时对军人纵容、笼络的坏习惯。

五是在宗室管理方面，缺乏正确教导、选拔推荐之法。

六是在财政管理方面，基本上没有法度，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操心勤勉而国家并不强大。

王安石认为，国家之所以百年无事，是老天爷眷顾，“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但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百年无事的背后有许多隐忧，政治上因循守旧，农民负担很重，军事上积重难返，“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是年距太祖立国刚好一百零八年。古人有“盛世”之说，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还来不及看到“康乾盛世”，他在《宋论·太祖》中指出，自尧舜禹三代之后，中国的盛世有三个。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但只坚持了两代。第二个盛世是贞观之治，但李世民一死，这个盛世也宣告结束。第三个盛世，就是北宋的盛世，这个盛世从太祖开始，一直到英宗，历经五世，历时最长，有一百余年之久。

但王夫之的北宋百年“盛世”说并未受到广泛认同，相比之下，王安石的百年“无事”说更为贴切。

王安石一对一奏，给神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札子中的那句“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令神宗怦然心动。

## 十二 大改是神宗的首选吗

事实上，神宗即位后，施政方向有三个选项：一是守成；二是小改，进行小范围改革；三是大改，搞大范围的全面改革。

神宗不愿守成，但在第二和第三个选项，即大改和小改之间，他一上来就要选择大改吗？

非也。

身在朝廷的司马光一度进入他的视野。

司马光，字君识，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1019 年生于光州光山县，比王安石长两岁。

司马光非等闲之辈，他出身望族，其父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他自小随父宦游，好学强记，见识过人，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十五岁时靠父荫得官，但他认为这不是正途，执意参加科举。1038 年，十九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初任华州判官。司马池于 1041 年去世，庆历年间宰相庞籍是司马池生前好友，见司马光对历史研究有兴趣，举荐他担任馆阁校勘。司马光借此机会，翻阅了朝廷密藏的大量典籍史料，这为他后来编撰《资治通鉴》打下了基础。

后来庞籍受人诬告罢相，贬为郢州知州。为报知遇之恩，司马光追

随他来到郢州，任郢州典学和通判。庞籍调任并州通判，司马光又跟着他到并州。因为这两件事，时人对司马光赞誉有加，认为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

第二年，司马光回朝任职，在群牧司、三司与王安石同僚为官，同为“嘉祐四友”。1060年十一月的同一天，二人被仁宗任为同修起居注。

在王安石蜚声朝野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积进之资。

担任同修起居注后不久，司马光被仁宗擢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朝廷规定，谏官三年一任，一般不连任。上任后三个月内无谏诤，便被视为不合格，解除职务。但如果谏言不当，触怒皇帝或者权贵，结果也不会好看。司马光直言敢谏，超期服役，干了五年。

司马光最大胆的进谏针对的是仁宗的一次亲民活动。

1062年正月十八日，仁宗莅临宣德门，观看相扑，与民同乐。仁宗龙颜大悦，当即对这些相扑选手赐银绢予以奖励。相扑选手中包括女子，而且也获得了赏赐。相扑是一项极受市井百姓欢迎的“百戏”，宋人笔记《武林旧事》称女相扑选手为“女鬪”，指其招数变幻难测，身法疾速如风。这些女相扑选手主要是热场，为男相扑手正式比赛制造人气。

二十八日，仁宗一上朝便接到司马光的《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司马光说：“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陛下圣德温恭，动遵仪典，而所司巧佞，妄献奇技，以污渎聪明。窃恐取讥四远。愚臣区区，实所重惜，若旧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令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若今次上元，始预百戏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

僚，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闻，因此宣召者，并重行谴责，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惧，不为导上为非礼也。”

司马光的意思是：宣德门是啥地方啊？代表国家形象啊，陛下贵为天子，怎么能如此轻浮不成体统呢？有关部门应严加管束，不能再让那些女子在街市上聚众裸戏。对管理百戏的官员要进行追责，不能让他们这样误导陛下。

谏官对皇帝如此直率地进谏、批评，且不受打击、处分，诉状还全文流传下来，显示了宋朝政治的优长。

同年，司马光呈上洋洋五千言的《论财利疏》，专论财政问题。论疏的主旨在于反对重敛于民，强调农业是天下首务，同时鼓励发展商业，促进流通。司马光认为，太祖初得天下之时，只有一百一十一个州，江南、两浙、四川等富饶之地都还是他国异域，又经常打仗，但没有听说财用不足；仁宗承祖宗之业，天下一统，拥有四百余州，地广物庶，承平积久，财政上却捉襟见肘，原因何在？原因在于朝廷收入少，开销大，官员奢靡享乐，巧取豪夺。应崇俭戒奢，选用廉吏，选练战士，培养理财人才，“减损浮冗而省用之”，而“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

《论财利疏》集中体现了司马光的经济改革思想，其核心是要回归儒家传统——以农为本、强本节用、轻徭薄役、仁义治国等。而这正是他与王安石的分歧所在。

英宗朝，司马光辞去谏职，仍任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后，参知政事欧阳修力荐司马光，说他德才兼备，政绩突出，并说他是促使仁宗传位英宗的关键人物之一。1067年闰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

英宗朝时，司马光有感于前代历史繁琐，皇帝不方便一一阅览，撰写《通志》八卷献上，受到英宗肯定。十月初九，司马光首次于迓英阁

为神宗进讲《通志》。神宗听讲后很高兴，赐其书名为《资治通鉴》，亲自作序，将司马光比作司马迁，对所著内容给予激赏。他还将自己在颍王府时所藏旧书三千四百卷赐予司马光参考。

1068年六月，鉴于国用不足，想必是了解到数年前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谈到节用，神宗命司马光主持成立一个名为“裁减局”的专门机构，裁减政府开支。

不料，司马光婉拒了。

司马光给出的理由是：国用不足问题应由皇帝、两府大臣、三司官员共同研究解决，经过深思熟虑，不能急。他后来甚至把写作《资治通鉴》当作理由，在七月所上的《辞免裁减国用札子》中，说最近在赶写《资治通鉴》，文字量太大，实在是太忙，难以兼顾其他工作。

神宗不得已，放弃设立裁减局的想法，收回了成命。

此事透露出了两条重要信息：

其一，神宗起初想建立裁减国用的制度，通过节用，解决财政问题。1068年三月，神宗就对文彦博等大臣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二》载：“帝以勤俭率天下，诏龙图、天章阁及禁中诸殿栏俱不用毡覆，励精为治，大修宪度，内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为之制，物为之法，虽藏冰、治灶、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节省。”神宗还明确下诏要求节省建造英宗陵寝的费用，并削减了新皇帝例行的赏赐。

其二，司马光关键时刻掉链子。在裁减局问题上，如果司马光不退缩推诿，对于施政方略，神宗有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神宗后来选择大改，与司马光的不合作不无关系。

宋人笔记《元城语录》载，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问司马光，神宗为

什么要搞改革？

司马光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仁宗朝后期，国家治理出现了问题，天下之事趋于舒缓，萎靡不振，士大夫多有不满，许多人上疏议论，国家政事面临不得不改之势。

第二，神宗即位时年富力强，不满当时两蕃不服、官员政事懈怠局面，希望恢复汉唐盛世，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意愿。

第三，当时的执政团队都不敢提出建议，只有王安石揣度神宗意图，以激烈的语言鼓动他搞改革。于是，神宗认为前朝治理不善，王安石是千载难逢的人才。

司马光说执政大臣都不敢提出建议，不敢提意见的大臣其实也包括他自己。

后来，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王安石执政之初，吕惠卿为变法辩护，在迺英殿进讲时说，先王之法，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百年不变者唯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道。神宗问司马光，吕惠卿讲得对不对。司马光说不对，“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观点是，国家并未大坏，用不着大更大革，修修补补就可以了。

从对待裁减局问题的态度看，假如让司马光替神宗选择施政方向，他不会选择小改或者大改，守成才是他的当然之选。

王安石、司马光两位极具人气的翰林学士在神宗面前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个性与风格。

### 十三 延和殿一锤定音

王安石回到朝廷，是为变法的使命，在与神宗的一召一奏中，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神宗的积极回应令他倍感振奋。但变法大计绝非是他君臣二人之事，在朝廷上下还不知变法为何物的情况下，必须通过适当方式，促使神宗将变法问题摆到台面，一则，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二则，形成支持变法的舆论场。

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第二天，神宗再次召见王安石，希望他就札子中提及的弊政，详谈“设施之方”——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神宗说：昨日将卿所奏札子看了好几遍，写得极为精到，“治道无以出此”。卿所提到的那些弊病、问题，想必已一一做了整治的计划，请给朕详细讲一讲。

王安石说：臣匆忙间有言不尽意之处，愿陛下在经筵进讲时再做讨论，“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

经筵，又称“经幄”“经帷”“讲席”，指中国古代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经筵这种御前讲席早在汉、唐已经设置，北宋始称经筵。仁宗对经筵讲读十分关心，令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由经筵官轮流入侍讲读，宰辅大臣列席旁听，称为“春

讲”“秋讲”。仁宗不断扩大经筵讲读的规模，以至 1058 年三月他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任侍读学士时，欧阳修上章请辞说：“侍读最为亲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今与经筵者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外议皆云经筵无坐处矣。”

神宗坚持说：你还是先给我讲讲。

王安石大略地讲了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神宗大喜道：这些见解都是朕前所未闻的，没有人能超得过，能不能一一写下来上奏？

王安石说：臣已建议陛下在经筵进讲中议论，讲学搞好了，设施之方，不言自明。如果陛下择术未明，臣不敢条奏。

神宗的欣喜溢于言表，但王安石相当冷静。

经筵无疑是讨论变法的极佳场合。经筵的创立，本意是为皇帝提供一个提高学问和治国理政能力而非议论政事之所。但孔孟儒经向来是治国指南，经筵讲读虽围绕经史，而皇帝问的问题不会只限于经史，若皇帝问到朝廷政治得失利弊，经筵官的奏对就会影响皇帝决策。有心的经筵官，会借机阐述自己的理念、观点。此外，北宋皇帝在听完经筵讲读后，通常还会令大臣“留身奏事”，研究具体政务，讲读内容就会对皇帝决策产生直接作用。

司马光就多次利用讲读机会表达观点。

1068 年二月，司马光进读《通鉴》，至苏秦、张仪约纵六国事。神宗说：苏张二人的口才真有那么厉害吗？司马光回答说：纵横之术，于治国无益，臣之所以将他们写入书中，是想让后人了解当时的风俗，全在逞口舌之强上，人君如果对他们偏听偏信，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司马光的这番言论其实是表达对王安石的不满。

同年八月，司马光进读《通鉴》后，神宗与他论及治道。

神宗说：州县长吏，多不得人，中书没有做到精择。

司马光答道：知人不易，天下有四百余州，都做到精择实在很难。但如果选好十八路监司，让他们选好所部知州，知州再选好知县，这样才能得人。现在的提刑司、转运使，就是古代的方伯、州牧，系一路安危，应当慎选天下贤才，不能只看资历，或者是为酬奖某人而做出的安排。

1069年十一月，司马光进读《通鉴》，至汉曹参代萧何事时说：曹参能谨守萧何之法，不无故变更，所以至惠帝时，天下无事，百姓富足。

神宗问：如果有汉一朝常守萧何之法，不作变更，行吗？

司马光断然道：不独有汉一朝，设使三代都能谨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所确立之法，虽至今其国亦可存。

司马光试图通过这些议论，影射、抨击王安石变法，对神宗决策施以影响。只是神宗耳根子硬，一直不为所动。

为便于进一步与皇帝之间开展对话、讨论，在提出搞好经筵讲读要求后不久，王安石力主恢复坐讲旧制。

汉唐及宋初，经筵以坐讲为主，皇帝、大臣坐着听，经筵官坐着讲。真宗晚年体弱，在让皇后刘娥协助处理政务之余，开始培养太子，令他参加经筵。仁宗年幼，需踩在小凳上才能够得着讲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请求站着授课，以便随时近前指点。经筵官站讲由此成为官定礼仪。

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等人对王安石的建议表示支持，说这是尊师重道，应该恢复。但刘攽反对说：侍讲者不能安坐，给皇上站着讲是

古今常理。皇帝让你坐，是显示为君者尊师重道；你主动请坐，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龚鼎臣、苏颂等人反对的理由是：乾兴以来，侍讲都是站着讲的，执行了五十年，岂可轻易改变？

神宗在征询宰相曾公亮意见后说，王安石当讲之日可坐。改变一项五十年一贯的制度并非易事，神宗没有贸然决定恢复坐讲旧制，但给以王安石特殊礼遇，令王安石受到鼓舞。

1068年六月、七月，黄河泛滥，河朔地区受灾严重。七月、八月间，京师、河朔又地震频发。宋廷组织赈灾，财政状况越发吃紧，宰相曾公亮奏请神宗，郊祀之后，不再依惯例对两府大臣赏赐银绢。

八月初九，司马光上《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札子》，认为凡布施恩泽应从下开始，裁减用度应从上开始，主张将公卿大夫所赐减半，其他文武朝臣的赏赐则一概不减。

十三日，王安石、司马光与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一同在延和殿，进呈郊赐札子。通常，本朝皇帝在垂拱殿御朝，召见群臣，处理政务。延和殿是大内的便坐殿，皇帝可在此更为自由地召见臣子，君臣说话的气氛较为轻松。

司马光先说：赞成曾公亮的主张，现在朝廷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应同意两府大臣辞去郊赐。

王安石说：从前常衮辞堂馔，时议认为如果常衮自己认为不胜任，就该辞去官职，不应空享俸禄。何况国用不足，也不是当前最紧急之务。

常衮是唐朝人，为人谨小慎微，唐代宗朝曾任宰相。所谓“堂馔”，是唐朝皇帝赐给在政事堂议事的宰相大臣们的一顿免费午餐。当时，另外一位宰相元载因贪污被杀，常衮更加小心，为示清廉，主动提出免去堂馔，自己掏腰包，不再花公家的钱。这个建议提出后，遭到很多大臣

的反对，有人对他进行冷嘲热讽，说如果知道自己不称职，就该辞去相位，只辞去一顿饭算什么？

王安石援引常袞辞禄的故事，意思是，两府的当务之急是整肃朝纲，尽快解决财政问题，只想着减少些赏赐之物，于事无补。

司马光反驳道：常袞辞禄也比那些持禄固位之人强，国用不足确实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说：国用不足并非当务之急，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

司马光又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租，榨干百姓罢了。百姓穷困，流离为盗，这难道符合国家利益吗？

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愤然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

王珪见二人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打圆场说：你们说的各有其理，请陛下裁决。

这是两位翰林学士理财思想的一次面对面的碰撞。

司马光坚持传统的儒家治国理念，力主“节用”，认为只要中央财政压缩不必要的开支，与民休养生息，藏富于民，就可以逐步改善目前糟糕的财政状况。

王安石主张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则更接近法家的治国理念，即通过发展生产、财富的增殖和理财来解决财政问题，正如他在上万言书中所提出的：“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

道耳。”

那么，“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果真是桑弘羊用来欺骗汉武帝的話吗？

事实上，恰恰是桑弘羊的变法帮助汉武帝实现了击败匈奴的夙愿。

自战国、秦以来，匈奴便为患中原。汉兴，高祖刘邦试图解决北部边患，出击匈奴，但在平城之战中惨败，他本人差点做了俘虏。此后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办法，怀柔匈奴。汉初实行黄老政治，山林水泽、矿山盐田、关卡市场通通开放，铸钱都交给私人经营，同时减轻赋税，形成“文景之治”。公元前141年，武帝即位，决意对匈奴动武。军事行动自前129年展开后，财政蓄积很快被消耗殆尽。武帝任用东郭咸阳、孔仅理财，未见成效。又于前110年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农，实施均输平准等改革，大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击败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

桑弘羊变法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是改革币制。废除一切旧钱，由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币制归于统一，结束了汉初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

二是实行盐铁官营。在二十八郡设盐官，四十郡设铁官，扩大了盐铁官营规模。

三是首倡均输法。各地每年向朝廷贡献的地方特产，人工往返、运输费用往往超过贡品原价，且长途运输易损坏或腐烂。官府为完成任务，常常抢购，商人乘机抬价，以次充好。为避免这些弊病，桑弘羊在各地设均输官，各地将应交的贡品上缴均输官，或按当地市价折成钱缴纳。均输官将朝廷所需物品运往京师，以所余货物和钱作资本，购买当地商品运到价高的地方售卖。这既增加了政府收入，又解决了各地距京城远近不一、运输负担不均问题。

四是创设平准法。在京师长安和各商业城市设置专门吞吐物资、平抑物价的机构，“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市场上什么货物贵，它就抛售什么，什么货物价格下跌，它就收购什么，使富商大贾不能垄断市面，抬价居奇，既能稳定物价，同时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均输和平准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体系，由此以长安为中心，建立起了遍及全国的国营商业网，对物质供应、价格进行调节。

桑弘羊还实行纳粟买官或赎罪，酒类专卖等政策。

桑弘羊的改革不仅大见成效，而且也未增加百姓负担。西汉田赋一直较轻，汉景帝时三十税一。汉武帝仍实行三十税一，除田赋外，还有算赋、口赋和更赋，武帝只将口赋每人每年增加三钱，其他两项都没有增加。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称赞说：桑弘羊变法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桑弘羊的实践证明，运用政府干预，由政府直接操控钱、粮、盐铁等物质的分配和供应，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可能实现在不增加百姓税负的前提下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桑弘羊因此备受武帝信任，前100年，被任为大司农，总管国家财政大权。武帝晚年对杀伐过度、劳民伤财、逼死太子颇有悔意，下《轮台罪己诏》，欲恢复与民休息政策。汉武帝去世后，遗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与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四人辅佐幼帝。

而围绕后武帝时代的治国方略问题，桑弘羊与霍光发生了尖锐对立。桑弘羊坚持富国强兵之策，霍光则力主“恤民”路线。公元前81年，霍光令各地推举贤良文学即儒生代表六十余人，集中到京师开会，讨论国家经济政策。会议由丞相车千秋主持，从二月一直开到七月，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等大夫为一方，贤良文学为一方。

双方争辩的焦点，是继续实行国家干预主义，还是实行与民休息的

经济自由政策？

大夫派认为：山泽之利在深山，小民无力开发，若国家“废弛而归之于民”，事实上只能为豪强所控制而专其利，山海之利应由国家直接管理，以断豪强兼并的财路，补充财政之用；农业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应“本末并利”，发展商业，实现财富的“增殖”，创办均输、平准，目的是促进商品交流，“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贤良文学则主张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认为这些政策与民争利，加重了百姓负担。

盐铁会议令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第二年，桑弘羊卷入燕王刘旦和上官桀父子谋反案，牵连被杀，西汉历史进入霍光专权时代。但桑弘羊被杀后，西汉朝廷并未大幅调整盐铁专卖政策，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及关内铁官。毕竟，盐铁是生活必需品，煮盐铸铁利润丰厚，是政府财政收入稳定而重要的来源。不止西汉，此后的古代中国长期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直至明、清两代，盐务始终由朝廷掌管，历代只是在政府管制的松紧上进行过调整。

王安石的话再次打动了神宗，但他没有公开驳司马光的面子，而是说：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裁减浮费应该从贵近大臣开始。这次两府大臣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但下不为例。前一句的意思是肯定司马光，后一句的意思是按王安石的意见办。

此时的神宗忧心忡忡，国库空缺的压力令他寝食难安，他召见两位翰林学士，是要尽快拿出对策、办法，做出决断。一个月前，为赈济河北灾民，神宗连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向民间征粮。之后，又再降空名诰敕，付河东路及鄆延路安抚司。“空名诰敕”，是指任命朝廷官员的授官凭信已经提前写好，但将被授官人姓名一项预留空白，以供地方长官临时填入。降空名诰敕，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以换取钱粮。这实属非常之举，财政问题已经紧急到火烧眉毛，形成倒逼改

革之势。

司马光大谈节用，但节用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守成、节用亦不能解决神宗的财政问题；王安石“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的主张，被司马光斥为谎言，但却是最打动神宗的一句话。

延和殿之争的第二天，迺英阁讲读罢，神宗单独留下王安石谈话，两府大臣都不敢先退，直到王安石出来。

十月，在一次讲读之后，神宗又单独留下王安石谈话，称赞唐太宗、刘备得人，说：“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王安石没有附和神宗，为进一步打消他的顾虑，重申了半年前首次入对时提出的主张——效法尧舜，建立更大功业。他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禹；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传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经济史家认为，围绕理财问题，中国古代发生了两次著名的“千年之争”，第一次即盐铁会议，第二次即延和殿之争，二者之间相隔千年。延和殿绝不是空谈的场所，事实上，它促使神宗下定了变法的最后决心，决定了神宗一朝的政策走向。汉武帝信用桑弘羊，实现了富国强兵、驱逐匈奴的夙愿，神宗为什么就不能信用又一个“桑弘羊”，重新创造历史呢？

转年，1069年（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 十四 得君者行道

在仁宗朝时的两上改革书中，王安石并未太多地关注财经问题。事实上，直到延和殿之争前，他的理财思想并未广为人知。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绝非凭空而来，一蹴而就，基层的历练，亲身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刻体察，最直接地催生了他的改革思想；李愬、商鞅、桑弘羊等历史人物，以及范仲淹等“当代人”给予了他多方面的启迪。

李觏也是一位对王安石变法思想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当代人”。

李觏，字泰伯，生年介于范仲淹和王安石之间，比范仲淹晚二十年，比王安石早十一年。

1037年，李觏乡试落榜，知范仲淹有知人之明，准备去拜访，但还未及前往，范仲淹因与宰相吕夷简交恶而远贬饶州，于是李觏专程前往饶州治所鄱阳拜访了范仲淹。十二月，范仲淹改任润州，邀请李觏为润州郡学教授，李觏正忙于著书，没有应约。1039年三月，范仲淹改知越州，邀请李觏讲学，不久，李觏返回家乡，继续著书立说。

1043年，李觏在家乡南城创办盱江书院。此时，范仲淹拜参知政事，实施新政。按照新政要求，南城始立郡学，郡守请李觏出面，主持学事，课业授徒，四方慕名求学者甚多，弟子达数百人，他很快成为誉满东南的著名学者，被尊称为“泰伯先生”。

李觏与范仲淹都出身贫困之家，李觏两次应试不中，但好学进取，认为“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与范仲淹有着共同的政治取向。庆历新政期间，李觏将自己所撰的《庆历民言》三十篇呈于范仲淹和富弼，对新政表示支持，认为“开讳”是改革政治的前提，要求君主除忌讳、开言路，正视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鼓励大臣直谏帝王过失。李觏同时给范仲淹写信，对他给予热情鼓励，并谈及节约用度、减轻赋税，以及对朝廷公然卖官行为的强烈反对。

李觏与王安石的思想有更多契合之处，二人都极推崇《周礼》，相信只要仿照《周礼》行事便能给国家带来太平。《周礼》本名《周官》，相传为西周时的周公旦所著，是一部有关周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著作，为古代儒家主要经典之一。

《周礼》规定，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属于天子，国家对土地拥有绝对控制权，耕地都按方块田形制进行规划，采取井田制和沟洫制两种形式，农民以家或夫为单位受田，对所授之田拥有使用权；总司国家财政和财政支出的为“天官”系统，主管财政收入的为“地官”系统；《周礼》创设了国家公库与王室私库分开管理制度、会计稽核制度、会计与出纳的分立制度、专卖制度、市场管理制度等；《周礼》重视农业，但并不忽视商业的作用，规定征收商税的机构为泉府，货物滞销时泉府进行收购，缺货时赊给、卖出，以维护市场物价的稳定。此外，《周礼》中的一些重要财政思想为历朝历代朝廷所遵循，比如：收支均节，专赋专用；发展生产，保障财政收入；贡赋、劳役以负担均平为准则等。

《周礼》明显带有某种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其制度设计的思想性远远超过制度安排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它所阐述的内容主要在于对未来制度设计的构想，而非对过去或现行制度运行的实录。历代改革家往往以《周礼》为依据，托古改制。《周礼》成为中国古代的改革指导书。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在当时，革新与复古是

混而不分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以‘先王之道’为他们革新的理论依据，更具体一点，所谓‘先王之道’，就是周公之法。周公之法的蓝图是《周礼》。他们认为《周礼》是周公治太平之书。要想治太平，就得照着《周礼》办事。”

李觏深受《周礼》的影响，庆历年间，他还写作了《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以《周礼》为依据，系统阐发了其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和教育思想。

李觏反对把“利”和“义”对立起来，肯定“利”的价值，主张君主理财，掌握、控制市场物价，防止奸商乘民之危，使老百姓受害。

李觏认为，足食足兵的关键在于农业的繁荣与稳固，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自由买卖政策，以及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此，他专门写了《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恢复《周礼》井田制的主张。

李觏看到当时商品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严重侵蚀，工商业者轻获倍利，诱使人们舍本逐末，主张参照桑弘羊“平准均输”之法，健全“平籴之法”。

在强兵方面，李觏主张兴屯田立利，用国家控制的官地强制兵士生产。针对佣兵靡财问题，主张发展乡兵，“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

王安石将《周礼》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在《答曾公立书》中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在《上五事札子》中说：“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神宗认为市易法繁琐，王安石引用《周礼·地官·泉府》中的论述说：“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政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

后来，为消除思想歧见，网罗变法人才，订立科举取士的新标准，王安石还专门设置经义局，自任提举，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完成《三经新义》，即《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颁发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王安石亲自修撰了其中的《周官新义》。

王安石曾在《答王景山书》说自己吸纳了李觏的思想，并称李觏以及他的学生曾巩是“江南的能文者”和“豪士”。

胡适先生认为：李觏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他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得君行道向来是古代士人的理想。理学家程颐在 1050 年的《上仁宗皇帝书》说：“臣前所陈，不及历指政治之阙，但明有危乱之虞，救之当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尽其诚；苟实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当服罔上之诛，亦不虚受陛下爵禄也。”

“一面天颜，罄陈所学”，说出了无数天下士子的心声。但程颐的上书并未引起仁宗的重视，在仁宗以及其后英宗、神宗朝，他都没有“一面天颜”的机会，只是在京师太学谋得一个讲学的职位。现实中，得君行道哪有那么容易？

得君者，是士大夫中的翘楚；得君而又能行道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王安石进入神宗的视野，并且幸运地得君行道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一，神宗欲大有为，主观上有强烈的改革愿望，这是王安石得君行道的前提。

第二，神宗通过一番考察，认为包括司马光在内，朝中没有可以倚

重的大臣，机会便留给了闲居江宁、因倡言改革而蜚声朝野的王安石。

第三，韩维从中大力举荐。

第四，王安石最终赢得神宗的信任和赏识，关键还在于他的变法思想与神宗契合。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王安石能成功吗？

## 十五 “强”相的落空

军事财政，为用兵找钱，是王安石变法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变法以财经改革为核心，辅之以军事、科举改革，构成了变法的“三驾马车”。

实际上，变法还隐含着第四架马车——政治改革。

1069年，拜参知政事后，王安石动作极快，同年一月，他便向神宗提出，应按《周礼》泉府之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握财权，议行新法。神宗同意，“乃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陈升之时任知枢密院，与王安石关系交好。

神宗特许王安石掌控条例司的人事任命。根据欧阳修的举荐，王安石向神宗推荐吕惠卿出任条例司检详文字。又让章惇担任三司条例官。苏辙、程颢也进入条例司任职。

宋初原有的财权系统为三司使—各路转运使—州（府军监）—县，条例司设置后，于各路设置提举常平司，并实际控制发运使，形成一套新的条例司—各路提举常平司的财权系统。在中央财政事务与国用决策中，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成为陪客，两府大臣也无权过问。

条例司属官有检详文字和相度利害官两种，前者主管文字、法案的起草，后者被派往各地及在京仓库查访财务、讲求新法利害的官员。

1069年四月，条例司首次派遣刘彝、谢卿材、王广廉、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八人出巡。本朝遣使出朝巡行虽有先例，但须经中书议决、皇帝批准，现在实际上成为条例司的特派员，这是史无前例的。

七月，条例司颁布均输法。

九月，条例司颁布青苗法。韩琦时判大名府，上疏力论青苗法的不是，王安石将其奏议交条例司疏驳，颁之天下。次年四月，陕西路出现抑配现象，转运副使陈绎处理了相关官吏，同时停止陕西路六州青苗钱的发放，以留作常平储备，希望恢复常平之法。条例司以“坏常平久行之法”弹劾其罪。就体制而言，此前唯有台谏官员有权弹劾百官。

条例司集行政、财政、立法、监察权于一身，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决策机关——宰相机构。原本位高权重的中书沦为只负责一般事务的办事机构。这一变，堪称中央行政体制的剧变。

很快有人上书反对，反对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侵夺中书宰相、三司之权，形成专权。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疏说：条例司无故创置，而且其所创新法，不经中书宰相熟议就颁行，“宰相之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敦请神宗“首还中书之政”。御史中丞吕公著上奏：朝廷大事，无不出于二府，条例司系国家安危，生民休戚，但宰相却不得参与其事。出判相州的韩琦奏称：条例司虽由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然而其议决事项不通过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接施行，如此，则是中书外又设一中书。

二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侵夺地方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州县之权。范

镇、司马光上奏说：条例司派出相度利害官和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分行诸路，侵扰了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地方州县之权。

三是王安石用人唯亲。侍御史知杂事陈襄认为：王安石聚集自己的门生属吏单独议定变法事宜，宰相、台谏都不得干预。

与此同时，条例司内部也出现分歧，1069年八月，苏辙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条例司乞外任状》，批评新法，被贬出朝，任为河南府留守推官。

十月，次相富弼罢，王安石举荐陈升之递补。但拜相后，陈升之不愿再同领条例司，建议将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于中书门下，神宗支持，但王安石反对。神宗改让王安石和韩维的哥哥、枢密副使韩绛同领条例司。

王安石之所以反对将条例司并入中书，是基于当时中书执政班子的现实情况。

王安石虽为班子核心，但毕竟是副相，执政班子五人中，保守派占多数。当时舆论有“生老病死苦”之说。“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变法。“老”指年逾古稀的首相曾公亮。“病”指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的次相富弼。“死”指反对变法，不久病死的参知政事唐介。“苦”指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的参知政事赵抃。

“生老病死苦”当是渴望改革的人制造的舆论，事实上，被誉为“死”“苦”的唐介与赵抃俱是一代名臣。

仁宗明道年间，唐介入朝为殿中侍御史。1051年（皇祐三年），仁宗拟提拔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使、群牧使。唐介上章请仁宗收回成命。仁宗免去张尧佐宣徽使、景灵使职，留下其他二使头衔。不久又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兼河阳知府。唐介再次上言抗辩。仁宗推说任命提议出自中书宰相，唐介马上弹劾宰相文彦

博，说他以不正当手段交接张贵妃，谋取宰相要职。仁宗恼怒，将唐介贬往岭南英州，同时将文彦博罢相。从此，唐介以“直声动天下”，被时人誉为“真御史”。

英宗即位后，唐介任为御史中丞。次年，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神宗即位后召为三司使，不久，拜参知政事。当初，神宗准备从江宁召回王安石时，唐介就明确表示反对，说王安石虽然有学问，但迂腐顽固，若让他执掌政事，必然会剧烈变更旧制。神宗召王安石入京为翰林学士，中书省呈送拟任官员名单，神宗看后说让王安石最后定。唐介很不高兴，对神宗说，陛下以为王安石可以重用，重用就是了，岂能让中书省把政事交给一个翰林学士来决断？臣近来说您常让某事某事请王安石决定，他同意就办，不同意就不行，既然如此，要宰相还干什么？这必然是认为臣等无能，如此，臣情愿罢职。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后，唐介多次同他辩论，神宗每次都支持王安石。

仁宗朝后期，赵抃担任殿中侍御史，被时人誉为“铁面御史”。1054年（至和元年）十二月，宰相陈执中的一个女妾一月内虐杀了三名侍女，赵抃从这年十二月至次年六月，连上十二奏章弹劾，终于令陈执中罢职。三司使王拱辰、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枢密副使陈升之等高官，均因赵抃弹劾罢官。1058年，赵抃出任梓州路转运使，不久任益州路转运使，他到四川任职时，以“匹马入蜀”，随身仅带一琴一鹤，沿途之人都把他当成走亲戚的老汉或做生意的客商。神宗得知此事后，大为赞赏，即位后召其为知谏院右谏议大夫，不久拜为参知政事。赵抃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说制置条例司设使者四十余人扰乱天下，王安石刚愎自用，诋毁天下公论为庸俗，要求神宗以人心得失为重，取缔青苗使者。

可以想象，王安石的变法如由中书领导，每件事都要征得另外四人，尤其是唐介、赵抃这种强硬大臣的同意，新法不用说施行，在中书门下省内部讨论时就可能被否决，根本送不到神宗那里。因此，必须另

起炉灶，扩大变法派的权力，减少阻力。这是王安石建言设立条例司的初衷，也是他反对将其并入中书的原因。

陈升之主张将条例司并入，显示其立场的变化。果然，他担任次相后便托病，在家养病百余日，神宗几次敦促劝谕，才回到朝廷。后遇母丧，陈升之去相位，回家守孝。

在提出动议的半年后，1070年五月，神宗还是下诏将设立十五个月的条例司罢归中书，其主要职能改由司农寺承担，由吕惠卿执掌。在罢撤条例司的同时，神宗以手札安抚王安石，给出一个缓冲期，让“有司结绝所施行事，久之乃罢”。不久，王安石在中书中专设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由曾布执掌。

由此，原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职能一分为二，司农寺负责实施青苗、免役、保甲、方田均税、市易、农田水利等与财经、军事相关的新法；检正五房负责实施考课、铨选、贡举、荫补等与科举、人事相关的新法。

按唐制，九寺五监形式上独立，实际上是与六部配合的办事机构。宋初，三省并于一省，三省六部形同虚设，除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军器监外，其余寺监大都名存实亡。司农寺被视为闲曹，事情不多，基本上配合三司，掌天子躬耕藉田、祀供及平籴、利农等事务。选择司农寺实施财经及涉农相关变法，也算合情合理。

1070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安石、韩绛同日拜相，王珪拜参知政事。韩绛排名在王安石之上，但人不在京师，而在陕西主持军务，只有宰相之名，并无宰相之实。韩绛指挥种谔等将领，在对夏作战中颇多斩获。但第二年三月，因庆州发生兵变，韩绛罢相，贬知邓州。

这时，中书执政班子已有很大变化。此前的九月，首相曾公亮罢相。次相陈升之为脱离两派斗争漩涡，告假在家不上朝。赵抃因为反对

变法，罢知杭州，改知青州。在名动一时的“阿云之狱”中，唐介认为阿云案中沒有自首一说，王安石坚持认为阿云是自首，神宗照例支持王安石，“（唐）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富弼的女婿、枢密副使冯京接任参知政事。冯京、王珪这两位参政虽不属变法派阵营，但也不像富弼、赵抃、唐介那般强硬作梗。

中书中实际主事的是王安石，变法并未受到制置三司条例司裁撤的影响，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陆续出台，到1074年，也就是变法的第六个年头，所有新法几乎全部出台。

神宗之所以要裁撤制置三司条例司，说明他基本认可反对意见，而且，王安石拜相后大权独揽，不会影响变法进程。还有，神宗觉得，这项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超出了他的预期。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目的固然是新设一个颁布、执行、推动新法的机构，但从其实际承担的职能看，它体现了王安石收回相权的努力——收回被三司侵夺的财权，甚至通过军事改革，收回兵权。按唐制，三省掌财权，六部中的兵部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在宋初的改革中，太祖为集权的需要，将财权、兵政从宰相事权中剥离了出来。

王安石想做一位“强”相，他收回相权的努力，意味着要从神宗手中夺回部分权力。

相权与君权的博弈，是贯穿中国政治史的一个古老课题。宰相作为文官首长，上丞天子，下接公卿，其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王朝内忧外患、皇帝年幼、帝党势孤之时，野心勃勃的宰相不仅权倾朝野，而且左右皇帝废立，甚至取而代之。博弈的结果是，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清初袭明制，亦不设宰相。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